
**蘇聯因素及
蘇聯變局**



蘇聯經濟形勢

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上台，4月召開蘇共中全會，提出“加速戰略”，企圖把蘇聯經濟從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代”挽救過來。但事與願違，戈氏一夥統治底下，蘇聯經濟每況愈下，1990年更陷於全面崩潰狀態。以下是一些具體數字(表21.1)。

柯錫金(KOSYGIN)1965年進行經改，把淨物質生產年均增長率從1961-65年6.5%提升至1966-70年7.8%。但1971年開始，增長持續放緩。雖然以“停滯”來形容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半葉的蘇聯經濟，乃誇大其詞，但15年來經濟一直一蹶不振，則是無從迴避的事實。況且，生產技術上，西方國家的「微型軟件革命」把蘇聯愈拋愈遠。直到七十年代中葉，印度對蘇聯貿易以出口原料和進口工業品為主。但此後，印度一些機械產品的技術水平已追上蘇聯，開始向蘇聯輸出。(註2)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頭四年半，增長放慢趨勢沒有扭轉，人民生活水準萌出惡化的苗頭(註3)，但直到1989年，經濟仍然屬於相對穩定，未出現滑坡。1990年的崩潰，是整個蘇聯和東歐政治形勢出現突變的結果，而戈爾巴喬夫經濟及政治政策上的失誤也起了加速作用。這點下文會有所論述。

表21.1顯示，七十年代下半葉，政府大力壓縮投資和國防開支，兩項開支增長率先後下降53%和50%。相比下，人均消費增長率僅下跌25%。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重新把軍備競賽升級。這迫使蘇聯提高積累率，因而令1981-85年的人均消費增長率比1976-80年下降36%。有關這個情況，以下是一些詳細資料(表21.2)。

一方面，生產增長率不斷下降，另一方面，軍備競賽升級又迫使政府提高積累率。這對蘇聯經濟帶來巨大壓力。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統計，淨固定資產投資佔國民收入比率從六十年代

表21.1：蘇聯經濟形勢，1961-1990年／年均增長率(%)

	61-65	66-70	71-75	76-80	81-85	86	87	88	89	86-89	90
淨物質生產	6.5	7.8	5.7	4.4	3.5	4.1	2.3	3.7	2.5	3.15	-4
勞動生產率	5.5	6.8	4.6	3.3	3.1	/	/	/	/	/	/
總消費	/	/	5.8	4.7	2.7	/	/	/	/	/	/
(不變價格計)					(81-84)						
人均消費	/	/	4.4	3.3	2.1	/	/	/	/	/	/
(不變價格計)											
投資	/	/	7.0	3.3	3.5	/	/	-7	-6	/	20
國防開支	/	/	4.0	2.0(76-82)	/	/	/	/	/	/	/

按：① 勞動生產率等於淨物質生產增長率除以職工人數增長率；

② 1971-85的投資數字為毛額，1988-90的數字為淨額。

資料來源：1961-85年各項數字(總消費一列除外)，愛·曉域特(EDWARD A. HEWITT)，《改革蘇

聯經濟：平等對效率》(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S EFFICIENCY)(華盛頓，1988)，頁52，轉引自喬·白拉錫卡(GEORGE BLAZYCA)，

《蘇聯：改革的經濟壓力》(“THE USSR: UNRELENTING ECONOMIC PRESSURE FOR REFORM”)，載《資本與階級》(CAPITAL AND CLASS)，第38期(1989年夏季號)，

頁32。根據史洛基斯蒂，同，頁68-70，1976-80淨物質生產年均增長率及投資年均增長率先後為4.2%和3.4%，而非上述的4.4%和3.3%；除此之外，1966-85的其他各項數字與上述相同。1971-85總消費數字見史洛基斯蒂，同，頁71。(註1) 1986-88年淨物質生產增長率數字見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歐洲經濟調查1987-88》(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1987-88) (日奈亞，1988)及《東歐市場》(EAST EUROPEAN MARKETS)，1989年2月10日號，轉引自白拉錫卡，同，頁32及36。1989及1990年淨物質生產增長率及1988-90年投資增長率見《經濟學人》，1990年12月22日號及1991年4月6日號援引國際貨幣基金會統計數字。

表21.2：消費和淨投資佔國民收入比率

	按不變價格計				按當年價格計	
	1981	1982	1983	1984	1981	1982
消費	0.756	0.738	0.736	0.735	0.766	0.738
淨投資	0.244	0.262	0.264	0.265	0.234	0.262

資料來源：史洛基斯蒂，同，頁93-94。

的17%一直持續上升到1988年的26%。(註4)

1981-85年，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平均低於國民收入2.5%。

(按：美國1988年財赤為國民收入3%。)1986年，上述比率突然升至多於6%。1988年更達10%。(註5)雖然國家各項補貼龐大，例如，食物價格補貼約佔財政收入15%，1990年達1,200億盧布(註6)，1989年底以前，財赤不斷上升主要是經改給企業讓利的結果。1985年，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47%；1989年下降至38%。(註7)1989年，財赤達920億盧布，雖比預算1,200億為低，但仍創歷史最高水平。(註8)根據財政部長華·奧爾洛夫(VLADIMIR ORLOV)及國家銀行行長格拉先科(GERASHCHENKO)向國會提交的報告，1990年的數字回落到580億布。(註9)這是蘇聯經濟於1990年唯一令人較為「欣慰」的事項。

政府應付財赤的辦法是增加貨幣供應。1989年貨幣供應比上年增加183億盧布；1990年1月至9月再增230億。(註10)貨幣供應暴升自然導致通脹。1986年通脹率為6.2%；1987年為7.3%；1988年為8.4%；1989年為12%至20%(非官方估)；1990年達18%至20%(非官方估計)。(註11)(按：1991年1月政

府提高零售價格以前，通脹緣於自由市場價格上升。）

按政府預算，1991年財赤將為267億（註12），佔國民收入比率3%。（註13）但首季數字已達311億。（註14）有關財赤情況於1990年有所改善後再次轉趨惡化的原因，下文會有所分析。

1987年開始實行的《企業法》給企業增加工資及發放獎金方面很大自由。1988年工資上升8%；1989年增長12%。（註15）但消費品生產與居民貨幣收入形成反方向發展，民間積存大量需求無法滿足的盧布。按官方數字，1990年初，總額突破1,000億大關，達1,047億；1990年底上升至1,327億。（註16）據一些非正式估計，實際數字可能高達5,000億之巨，超過一年的總零售額。（註17）

1989年以前，蘇聯外部收支情況令人滿意。以下是詳細數字（表21.3至21.5）。

可見，八十年代以來，直到1988年，蘇聯硬貨幣貿易及硬貨幣來往賬戶均有盈餘；硬貨幣外債及償債率均處於低水平。政府1988年開放外貿，允許15,000個企業獨立從事外貿，進口由此迅速標升。（註18）1989年，硬貨幣來往賬戶馬上轉盈為虧，1990年赤字超過100億美元。1989年，償債率越過25%水平。1991年1月至5月，遲還款項達15億美元。（註19）

除進口猛升外，導致外部收支環境轉趨困難的另一個原因是出口下降。這與經濟於1990年出現嚴重滑坡有密切關係。一向以來，石油出口佔蘇聯硬貨幣收入約四成。1990年石油產量下跌6%。（註20）1991年1月至5月，出口猛挫49%。（註21）

表21.3：蘇聯硬貨幣來往賬平衡(十億美元)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平衡	/	/	/	/	/	2.4	-0.7	0.6	2.5	7.5	-0.6	/	/	/	/	/
總貿易平衡	/	/	/	/	/	3.4	-0.7	4.3	6.2	4.1	0.7	>4	8	<5	0	-6
來往賬戶平衡	-6.1	-3.9	-1.3	-1.7	0.6	3.6	-0.8	4.1	6.1	4.3	0.6	>2	7	2	-4	>-10

資料來源：1975-85年，史洛基蒂斯，同，頁32及45。1986-90年，《經濟學人》，1991年1月19日號，頁46援引國際貨幣基金會數字(按：由於《經濟學人》以圖表顯示，故上述僅為約數)。

表21.4：蘇聯硬貨幣外債(億美元)

70	71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90
毛額	18	59	114	/	177	172	172	178	209	200	205	216	252	542
淨額	/	6	17	16	101	112	91	96	125	99	108	105	145	430

按：淨額相等於毛額減去蘇聯在西方國家的硬貨幣資產。

資料來源：1970-85年數字，史洛基斯蒂，同，頁34及50。1990年毛額為官方數字

(《南華早報》，1991年7月18日)；淨額見《經濟學人》，1991年3月9日號，頁80。

表21.5：蘇聯償債率(%)

72	74	75	77	79	80	81	82	83	85	89
17	15	23	27	24	8	9	8	8	14	>25

資料來源：1972-85年，史洛基斯蒂，同，頁41及64；1989年，

《經濟學人》，1990年5月19日號，頁80。

蘇聯經濟1990年出現滑坡的原因

蘇聯1990年以來的經濟情況成為全世界的笑柄。把蘇式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同的右翼人士更藉此機會大肆為私有制進行渲染、宣揚。為什麼蘇聯經濟會從直到1989年的相對穩定弄至如此地步？

戈爾巴喬夫上台的任務是要扭轉經濟頹勢。但至今為止（現為1991年9月），蘇聯經濟改革可謂乏善可陳。相反，政治改革方面，戈確實大刀闊斧。

戈上台後不久便解除報禁。有關貪污、娼妓、環境污染、官僚特權……等社會、政治問題的報導，填滿了報刊的篇幅。地下刊物得到默許，迫害結束。1986年4月切爾諾貝爾事件後，“開放”政策發展更一日千里。政治局委員兼中委會宣傳部長亞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把批評斯大林時代的禁片《懺悔》解禁，帶來巨大社會反響。之後，以前的禁書、禁畫、禁歌等陸續面世。1986年12月23日，在戈爾巴喬夫親自邀請下，薩哈洛夫結束緣於批評入侵阿富汗的七年國內放逐生活，從哥爾基市（GORKY）返回莫斯科，象徵政府容納異議達到新里程。

知識分子利用解禁給歷史還以本來面目。1987年11月俄國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日，戈爾巴喬夫公開把斯大林壓迫人民的做法形容為罪行。1988年，被斯大林以捏造罪名清除的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老布爾什維克，紛紛獲得平反。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特別黨代表會議。會議容許西方記者現場採訪。蘇聯人透過電視收看到會議過程。較早之前於1987年11月被貶的葉利欽要求會議為他平反。戈爾巴喬夫及利加喬夫（YEGOR LIGACHEV）被迫把罷免葉利欽的內幕公

諸於世。雖然會議拒絕葉的要求，全國人民能夠在電視收看到這種情況，震撼性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舉行差額選舉，不少蘇共領導人焦頭爛額。例如，列寧格勒所有官方候選人全軍覆沒。激進分子共贏得人大兩成議席（其中部份仍隸屬共產黨）。

1989年5月25日，人大召開首次會議。會議全程每日由電視現場直播。開幕日會議一開始，一名代表步上講台，要求會議為4月8日武裝部隊血腥鎮壓第比里斯民族主義示威的死難者默哀。與會代表無可奈何起立響應。該名代表跟著就事件提出質詢。會議終於被迫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真相。（註1）

激進改革分子 施·史丹基域奇（SERGEI STANKEVICH）（現為莫斯科副市長兼葉利欽助手）要求會議命令保安部隊批准會場外的示威者進行示威。戈爾巴喬夫指示內政部長巴卡京（VADIM BAKATIN）向會議作出報告。蘇聯人在電視看到自廿年代以來，第一位政府首長被要求為政府的政策辯護。辯論中，戈爾巴喬夫對會議程序的掌握出現混淆，代表就發言權發生爭執，會議陷於混亂。辯論結果，會議批准史丹基域奇的要求。以上情景蘇聯人都能夠一一即時親眼收看到。（註2）

毫無疑問，1989年春的人大選舉和人大首次會議的情況，令蘇共政權的權威性受到嚴重創傷。人大一次會議後，一份銷量三千萬份的刊物進行讀者調查，薩哈洛夫位列“最受歡迎代表”榜首，葉利欽第二，戈爾巴喬夫竟排行第十七。戈爾巴喬夫以為可以透過把政權局部開放來提高或挽回蘇共政權的威信，但結果適得其反。

自二十年來，蘇聯一直是一個高壓社會。現在，這種壓制一下子被解開，社會各種潛伏矛盾紛紛湧現出來。

蘇聯是一個有百多個民族的帝國。極權統治下，民族矛盾沒有機會抬頭。“開放”及“重整”政策實施後，民族主義便乘勢而起。第一個發難的民族糾紛由亞美尼亞策動。（註3）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是一個位於

阿塞拜疆境內的山區，居民以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為主（阿塞拜疆人相反信奉回教）。亞美尼亞要求中央政府把該區歸還亞美尼亞。1989年春，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發生嚴重流血衝突。中央政府要出動軍隊才能控制局勢。

自1989年3月人大選舉，格魯吉亞爆發一連串民族主義大示威。4月初，戈在英國進行訪問。7日，戈一行人等返回莫斯科，利加喬夫在機場向戈報告政治局已派遣軍隊進入格魯吉亞首府。與戈同行的亞科夫列夫和謝亞爾德納澤沒有任何表示。戈詢問謝是否有需要由他（謝為格魯吉亞人）前往格魯吉亞視察局勢，眾人表示同意，於是戈馬上致電格魯吉亞領導人。但對方回覆沒有需要。各人於是把事情暫時按下。（註4）

翌日，示威演變成軍民衝突。鎮壓中，廿人死亡。

1988年6月，立陶宛共黨領導人巴拉索思卡斯(BRAZAUSKAS)在一個 SAJUDIS(註5)集會上，表示立陶宛共產黨要為立陶宛的權利進行鬥爭。巴拉索思卡斯向巴卡京表示，立共只限於爭取立陶宛經濟上獨立，不會要求政治獨立。不久後，立共把立陶宛文訂為官方語言。（註6）

1989年3月人大選舉中，SAJUDIS贏得壓倒性勝利。人大首次會議上，立陶宛54名代表中50人在一次投票中投棄權票，跟著便集體退出會議。巴拉索思卡斯在主席台上不知所措。戈爾巴喬夫指示他進行游說。後來，戈本人及安·盧基揚諾夫(ANATOLY LUKYANOV)也參與游說，但同樣不得要領。以上情況一一呈現於蘇聯電視屏幕上。（註7）

1989年12月22日，立共召開特別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脫離蘇共。「聖誕」節前夕，蘇共中委會召開秘密會議，討論立共事件。有代表要求把巴拉索思卡斯開除出黨。（註8）但木已成舟，立共的分裂已不能收回。（註9）

1989年東歐出現變局，使人認識到蘇聯的脆弱。東歐各國爭脫蘇聯的控制，蘇聯竟然完全束手無策。加盟共和國和地方的分裂主義傾向於是更火上加油。

1989年12月，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進行地方選舉，人民陣線輕易贏得超過半數議席。1990年2月1日，摩爾達維亞（現稱作摩爾多瓦，為方便起見，本文劃一使用舊名字）舉行共和國國會、地區及地方選舉。民族主義者又取得勝利。

2月，立共公開宣佈支持立陶宛獨立。該月7日，立國會宣佈蘇聯1940年把該國併吞無效。

1989年12月7日，東德共產黨與反對派同意於1990年5月6日舉行多黨制選舉。12日，保加利亞宣佈1990年5月6日進行多黨制選舉。至此，東歐先後已有五個國家（波、匈、捷、東、保）放棄一黨專政。但東德和保加利亞的宣佈顯然來不及影響12月中旬召開的蘇聯人大二次會議。會上，戈爾巴喬夫堅持蘇聯有需要維持一黨專政。

12月25日，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宣佈明年4月舉行多黨制選舉。於是，經互會東歐六個成員國已全部放棄一黨專政。另一方面，2月底至3月，多個加盟共和國將舉行國會、地區及地方選舉。這環境下，蘇共終於在1990年2月7日中全會決議放棄一黨專政。

戈爾巴喬夫不到兩個月內完全改變有關一黨專政的立場顯然是受到東歐變局1989年12月份的進一步變化所影響。直到1989年10月，戈爾巴喬夫在對東歐政策上表面看來還處於主動地位。（註10）但東歐變局從團結工會政府成立起到1989年底的轉變，完全超乎戈爾巴喬夫的估計。他的東歐政策於是從一個表面上的主動位置轉變到一個完全被動的地位。倘若他不跟隨東歐六國放棄一黨專政，他自上任以來整套以消除冷戰為目標的外交政策肯定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

戈改變上述立場似乎還有另一個意圖。那就是希望藉此為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在即將來臨的三級選舉挽回一些選票。（但如前所述，人大選舉和現場直播人大首次會議的經驗表明，這不僅是一個徒然的幻想，更相反會帶來反效果。）

戈爾巴喬夫很多政策都是迫於現實而制訂的。但接受必然

的節奏總有一定迴旋餘地。戈給人的感覺是他在接受必然時往往操之過急，流於自動棄關，變成不戰而敗。（註11）西方傳媒喜歡把這種做法描繪為「雄才偉略」，只不過是由於戈自動給西方長驅直進大開方便之門罷了。

如剛才指出，戈在 2月 7日中全會放棄一黨專政有為共產黨挽回選票之意圖。但效果果然適得其反。中全會自亂陣腳的決定使民族分裂主義者變得更加囂張。

2月15日，立陶宛進行國會選舉首輪投票（次輪於 3月4日舉行），人民陣線橫掃九成議席。

3月4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亦舉行國會選舉。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烏克蘭首府）等多個地區、地方也於同日進行議會選舉。（次輪投票於 3月18日進行。）民族主義者屢傳捷報，絕大部份都控制超過三分二議席。

9日，仍由共產黨執政的格魯吉亞繼 1989年4月後再次發難。國會通過決議，譴責蘇聯1922年把格魯吉亞併吞，要求與中央政府展開談判，恢復獨立地位。

10日，人大三次會議應戈要求，設立總統職位，用意在於應付日益猖獗的民族分裂主義。當晚立陶宛國會召開緊急會議以商對策，最後決定於翌日宣佈獨立，實行先發制人。

17日，烏克蘭人民陣線宣佈成立軍隊，呼籲烏克蘭人拒絕服中央政府兵役。

18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舉行國會選舉。愛沙尼亞分裂主義者在首輪投票已奪取105席中78席。兩輪投票後，拉脫維亞獨立主義者也囊括超過三分二議席。

21日，贏得選舉勝利的烏克蘭人民陣線宣佈爭取獨立。同日，格魯吉亞國會刪除憲法中維護一黨專政的條文，把原定25日舉行的國會選舉押後至10月，以便民族主義者有充份時間作出籌備。

25日，愛沙尼亞共產黨脫離蘇共。

30日，愛沙尼亞發表《獨立宣言》。

4月9日，拉脫維亞國會以71對 3票通過停止為中央政府服兵役，呼籲戈爾巴喬夫展開談判，恢復該國獨立地位。

5月4日，拉脫維亞國會以 138票贊成，零票反對，一票棄權通過正式宣佈獨立。（代表俄羅斯及其他少數民族的57個代表抵制投票。）

30日，剛履新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表示俄羅斯應該於 100日內實行獨立。

6月12日，俄羅斯國會以 907對13票通過，發表《主權宣言》。

20日和24日，烏茲別克及摩爾達維亞爭相效尤，先後發表《主權宣言》。

7月，戈爾巴喬夫頒佈總統行政命令，要求各地解散非法的武裝部隊和把武器充公。

16日，烏克蘭發表《主權宣言》。

10月24日，俄羅斯國會宣佈，未首先得到它的批准，所有中央政府法例一律無效。（此前，蘇聯國會決議，中央政府法例在各加盟共和國有優先效力，作為對獨立及主權運動宣佈加盟共和國法律凌駕於中央政府法律的回應。）

27日，民族主義者在格魯吉亞國會選舉取得勝利。11月中，民族分裂主義者組成格魯吉亞政府，但沒有立刻宣佈獨立。同月，俄羅斯與烏克蘭、哈薩克簽署條約，互相承認對方為獨立主權國家。

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及主權運動愈演愈烈之際，一些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州亦上行下效，紛紛自我升格，宣佈成立主權共和國。例如，11月，摩爾達維亞的土耳其裔嘉嘉烏斯族(GAGAUZ)、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人(SOUTH OSSETIANS)先後揭桿而起。

面對國家走向四分五裂，戈爾巴喬夫11月至12月間先後改組中央政府架構及草擬新聯盟條約，企圖挽回國家完整。中央政府增設聯盟會議(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成員包括聯盟總統、副總統、及各加盟共和國總統。（註12）

根據新聯盟條約草案，國名中的「蘇維埃」由「主權」代替，俄語及英文的簡寫CCCP及USSR可以原封不動保留下來。(註13) 聯盟總統和副總統經由直選產生。立法會分為兩院，下議院稱為聯盟院(CHAMBER OF THE UNION)，通過直選產生，上議院為民族院(CHAMBER OF NATIONALITIES)，由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及自治州政府派出代表組成。中央政府權力限於戰爭、締結和約、國防、國家安全、能源、運輸、通訊、貨幣等領域。(註14)

草案仍未公佈，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及格魯吉亞經已表示，無論如何都不會參與任何新條約的制訂。

1991年2月9日，為抗衡戈爾巴喬夫將於3月17日舉行的保留聯盟完整的全民投票，立陶宛自己率先進行全民投票。3月4日，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效尤。三國投票結果再一次肯定獨立的決心，贊成獨立比率為：立90%；愛64%（按：愛人口中僅65%為愛沙尼亞人，投票率為85%，其中75%贊成獨立）；拉78%。

3月17日，戈爾巴喬夫孤注一擲，毅然進行全民投票。選民被問：“你是否認為有需要保留蘇聯作為一個更生的由平等的主權共和國組成的聯邦？這個聯邦充份保障所有民族的人權和自由。”雖然投票結果(76.4%票數贊成)令戈感到滿意，但卻沒有實際效果。

3月31日，格魯吉亞進行全民投票，維持獨立的決定。此前，亞美尼亞宣佈六個月內舉行獨立全民投票，但會依照蘇聯憲法規定完成獨立過程。

6月17日，戈爾巴喬夫與九個加盟共和國召開的「九加一」會議終於就新聯盟條約達成基本諒解。但這並不意味戈取得勝利。首先，先後發表《獨立宣言》及《主權宣言》的七個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俄羅斯、摩爾達維亞、烏茲別克、及烏克蘭）當中，僅俄羅斯、烏克蘭及烏茲別克有參與「九加一」談判。其他四國，聯同亞美尼亞及格魯吉亞

堅持脫離蘇聯。

其實，各加盟共和國就留在或脫離聯盟的取向有一定經濟基礎。第一，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貿易佔它們國民收入的比率都十分高，由烏克蘭和哈薩克最低的32%到土庫曼最高的76%。俄羅斯是唯一例外，比率為15%，主要貿易伙伴為烏克蘭。不計俄羅斯，平均比率為48%。（註15）所以，很多加盟共和國，尤以中亞那些細小和貧窮的共和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及烏茲別克），都選擇留在聯盟內，因為脫離會為它們帶來極大經濟困難。（烏茲別克發表《主權宣言》，用意不在於脫離聯盟。在其他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或發表《主權宣言》的情況下，這是保持主動性的手段。八·一九政變流產後，各國爭相宣佈獨立，其中很多都只不過是為了爭取主動以抵抗俄羅斯霸權主義，而非真正鬧獨立。）

再者，基於蘇聯國內價格與世界價格的差異，部份共和國得到其他共和國或多或少的貿易津貼。其中決意脫離的六國之中，除亞美尼亞外，其餘五國都獲得顯著津貼。阿塞拜疆和白俄羅斯情況一樣。把國內價格與世界市場價格靠齊的最大得益者是俄羅斯。現時，上述價格差異使它每年津貼其他共和國達640億盧布之巨。葉利欽更認為數字高至700億。（註16）這便是俄羅斯擁護激進經改背後的真正原因。相對上自給自足的俄羅斯發表《主權宣言》，希望擺脫其他共和國（烏克蘭除外）的負累，也出於同一考慮。不明白這個道理而把葉利欽一夥美化的論調，僅屬無知。這些論調似乎忽略了，為了繼續佔有俄羅斯境內的資源，葉等人對於俄羅斯內部少數民族要求自決同樣不容忍。（註17）除俄羅斯外，烏克蘭和哈薩克現時亦給予其他共和國為數不少的津貼。（註18）應當留意，從打破上述價格差異獲益最大的這三個共和國（即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對新聯盟條約的制訂起著支配作用。

經濟上，脫離聯盟對波羅的海三國有所不利。根據英國伯明翰大學韓遜（PHILIP HANSON）估計，三國國民收入會因此而

下挫10%。(註19) 雖則如此，三國決意獨立仍有其經濟考慮。正如東歐各國一樣，三國相信經過一段困難過渡期後，西方的扶持可令它們的經濟發展與西方靠齊。(至於這個想法是否僅為幻想則是另一個問題。) 況且，經濟改革亦遲早會把它們現時得到的貿易津貼取消。

上述價差對亞美尼亞影響甚微。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問題顯然為它與聯盟政府之間種下仇恨。但1991年7月24日，亞美尼亞改變態度，宣佈加入新聯盟條約談判。考慮到它與其他共和國的貿易佔國民收入57%，這是可以理解的。

綜合上述，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自決要求，均有一定經濟基礎。格魯吉亞和摩爾達維亞是民族主義蓋過經濟考慮的兩個特殊個案。(1992年1月增補：摩爾達維亞現已參加獨立國家聯合體。若獨聯體能站穩陣腳，格魯吉亞內戰結束後亦應該會參加。)

參加「九加一」談判的共和國可分為兩類。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白俄羅斯、阿塞拜疆屬於第一類。它們均希望保持聯盟完整。第二類包括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聯盟馬上解體對於它們來說亦沒有好處(經互會解散對東歐各國經濟的影響足以為戒)。所以，它們願意保留聯盟，但必須以擺脫中央政府的掣肘和其他共和國的負累(這兩點為銀幣的兩面)為條件。(1992年1月增補：表面上，獨聯體的成立否定了筆者這個判斷，請參閱下文《蘇聯解體》。)

倘若我們對「九加一」諒解內容加以細緻分析，不難發現，它基本上符合了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的要求。

新聯盟條約承認加盟共和國為“主權國家”，有權脫離聯盟，中央政府無權加以否決(這間接表示新聯盟將容許立陶宛等六國獨立)。共和國可以在外國設立使館。除共和國明文賦予聯盟政府的權限外，共和國法律凌駕於聯盟法律。土地、天然資源及大部份國家財產歸共和國所有。聯盟政府沒有獨立徵稅權，所有稅收首先由共和國徵收，然後共和國上繳部份(比

率未定)給中央財政。聯盟政府內閣由加盟共和國推舉產生。中央政府負責外交、國防及中央財政,但所有決策由中央政府和共和國共同制訂。雖然聯盟實行單一貨幣,但條約沒有規定聯盟中央銀行可以推行統一的貨幣及信貸政策。聯盟的統一性主要體現於單一國籍、統一的市場、對外宣戰、締結和約、和對聯盟軍隊的統一指揮(內政部和民防部隊則歸共和國管轄)。(註20)其實,上述仍僅屬於基本取向,各加盟共和國就個別條文仍存在不少紛爭。例如,烏克蘭堅持發行自己的貨幣。再者,草案中很多條文十分空泛,有待日後加以明確化,進一步糾紛在所難免。

顯而易見,「九加一」協議(後來因亞美尼亞加入變為「十加一」)非不代表戈爾巴喬夫贏得勝利,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了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有條件地保留聯盟完整的需要。戈爾巴喬夫在協議中擔當的角色,僅為一個調停人,斡旋於俄、烏、哈三國與其他六國(後為七國)之間。對於各小國來說,戈的價值在於協助它們盡量抵擋俄、烏、哈(尤其是俄)的霸權主義。就俄、烏、哈而言,戈擔當著穿針引線的功能。

國家瀕臨四分五裂對一個市場經濟亦會構成嚴重打擊,對一個計劃經濟則更加致命。

如前所述,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貿易佔它們國民收入比率非常高。以下是詳細情況(表22.1)。

以前,各地工礦企業及其他經濟單位的產、供、銷均按計劃安排。現在,各共和國紛紛設關卡、徵關稅、劃邊界,對其他共和國實行經濟封鎖,中央政府三申五令,它們完全置若罔聞。牽一髮而動全身。現代經濟社會分工精密,任何一個環節發生問題都會產生多米諾骨牌連鎖反應,影響遍及整個經濟。對於高度依賴共和國之間進行正常貿易的蘇聯經濟結構,情況尤為如此。緣於政治因素的諸侯式的經濟割據使蘇聯陷於癱瘓。誠如雷日科夫在1990年出現嚴重食物短缺時所說:“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很多困難緣於我國經濟一向基於嚴格指令的統一性

現時不再發揮效能……。”(註21) 以下是一些實例。

1990年夏，愛沙尼亞終止售賣穀物給中央政府。“糧倉”烏克蘭對超出計劃指標的所有糧食出口實行禁制。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爭相效尤。一向為國內蔬果主要出口地的烏茲別克出於買糧難，被迫把菜田、果田改為種植穀物。1991年1月，愛沙尼亞單方面提價，藉以鼓勵本地生產和增加輸入。跟著，其他

表22.1：加盟共和國之間的貿易(1988)

	總額(億盧布)	貿易佔國民生產比率(%)
俄羅斯	1382	15
烏克蘭	831	32
白俄羅斯	324	49
哈薩克	220	32
烏茲別克	206	41
阿塞拜疆	117	43
立陶宛	117	49
格魯吉亞	107	46
摩爾達維亞	98	52
拉脫維亞	91	50
土庫曼	79	76
亞美尼亞	77	57
愛沙尼亞	57	52
吉爾吉斯	55	45
塔吉克	50	47

按：美國及英國的比率先後為20%和約40%。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1990年10月20日號。

加盟共和國也先後提價。共和國給本地居民發配售券，防止外

地人前來搶購。(註22)

糧缺引致工礦業地區以牙還牙，封鎖甚至威脅完全斷絕給農產品供應地工礦產品供應。(註23)

1990年11月底，莫斯科食物供應出現嚴重危機，引發恐慌性搶購。(註24) 12月1日，列寧格勒自二次大戰納粹德軍圍城900日以來首次實行糧食配給，受影響貨品包括肉類、牛肉、雞蛋、植物油、麵粉等。(註25) 戈爾巴喬夫竟然需要向西方國家尋求糧食援助。(註26)

其實，蘇聯農業1990年大豐收，產量創歷史紀錄，達2.4億噸，比1978年的2.3億噸還高出超過4%。(註27) 但到10月份止，國家1990年的收購計劃僅完成76%。(註28) 由豐收變成短缺，除了是由於農產地封鎖出口外，還有其他因素。一向以來，蘇聯農業需要依賴城市的季節性勞工(工人、學生等)幫助收割。但分裂主義的冒升，加上派系間的政治鬥爭，驅使多處地方拒絕提供所需的勞工。例如，列寧格勒市長兼激進改革派大將安·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禁止該市工人參加收割工作。(註29) 當時，激進改革派正刮起迫雷日科夫辭職的「倒閣風」。為求達到這個目的，索氏竟刻意破壞國家經濟，以求增加雷之壓力。

農產地封鎖農產品出口，換來工礦產品地區實行報復。終於，在燃料及季節性勞工短缺下，大量農產品在田間及倉庫腐爛。再者，國家陷於分崩離析，舊有統治形態潰壞，各級大小官僚幹部乘機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國營商店空無一物，黑市市場及自由市場卻供應充足，各類貨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上文指出，蘇聯1991年預算財赤為267億盧布，但首季數字已高達311億。究其原因，還不外是國家四分五裂的惡果。1991年1月，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國會通過共和國財政預算案，批准撥給克里姆林宮780億盧布，比中央政府要求少270億。(註30) 4月初，聯盟國會財政委員會主席向國會報告，各加盟共和國或是沒有履行或是凍結上繳中央財政的任務。(註31)

1991年首季，加盟共和國上繳的實際款項，僅及預算39%。

(註32)

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經改毫無建樹，當然是蘇聯經濟面對困難的原因之一。但1990年以來的大滑坡，主要是政治形勢的產物。雖然這個形勢的出現有一定必然性，但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政策上的失誤猛然把它加速和激化。舉一個簡單的例證：東歐變局從匈牙利變局和波蘭變局發展到1989年10月至12月的突變，中間以東德變局為轉折點。上文分析，東德變局緣於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拆除與奧地利邊界的鐵絲網，導至東德逃亡潮。東德政府曾因此多番向匈牙利提出抗議和進行交涉。雖然匈牙利投向西方懷抱的發展已無法挽回，蘇聯當時對它仍能發揮一定影響力。倘使蘇聯利用這個影響力適當地介入事件，東德政府國慶日前後一段時間所面對的壓力肯定會大為減輕。這樣，東德變局的歷史便可能改寫，而東歐1989年末的突變亦可能會以一種較為漸進和溫和的方式發生。（當然，介入會打擊戈的新東歐政策，但衡量利害得失，不介入比介入的代價大無數倍。就這個問題，第廿四章有詳細分析。）如前所述，蘇聯國內的分裂主義因東歐突變而變得甚囂塵上。可見，蘇聯經濟1990年的大滑坡與戈爾巴喬夫和謝雅爾德納澤東歐政策的失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蘇聯經改歷程

1985年至1990年 2月蘇共中全會

(一)私營經濟發展。1986年11月19日，政府通過《個人勞動活動法》(LAW ON INDIVIDUAL LABOUR ACTIVITY)，翌年5月1日起生效。法例容許市民開辦私營工場，但禁止僱工(一同居住的家人除外)；禁止從事純貿易活動；禁止從事“對社會其他利益有損”的活動。國營部門職工只准在工餘時間參加經營。經營牌照以五年為上限。經營範圍受法例明文限制。(註1)

1987年6月，蘇共中全會通過經濟改革方案(詳後)，但沒有給予私人財產法律地位。

1988年5月26日，政府通過《蘇聯合作社法》(LAW ON CO-OPERATIVES IN THE USSR)。法例規定，合作社可擁有私人生產資料，不設價值上限。(事實上，既然1986年11月的法例容許私營工場，私人生產資料自然存在。《合作社法》進一步在法律上加以確認，間接給予私人財產法律地位。)合作社社員數目不設上限，但必須參加經營。社員收入同時以按股分紅和按勞分配為標準。法例更容許合作社僱用兼職工人。經營範圍比《個人勞動活動法》的規定有所拓闊。(註2)

1988年12月29日，政府通過法例把合作社的經營範圍收窄。例如，不准提供醫療服務，不准釀酒等。1989年10月中旬，國會修訂《合作社法》。主要改動為：政府規定合作社產品價格的權力有所增加；地方政府被賦予更大權力界定合法經營範圍；重申不容許純貿易活動，這類活動必須在1990年1月1日前完全停止。(註3)顯而易見，私營部門經過一年多的發展，政府便重新加以收緊。再者，政府亦不願意正式給予私人財產法律地位。1989年12月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把私人財產合法

化問題擱置。

以下是私營部門的狀況(表23.1)：

表23.1：蘇聯私營部門

	合作社／工場數目	在職人數	產值
1987年10月	8,000	88,000	350萬盧布(1987), 相等於淨物質生產0.1%
1988年	/	/	60億
1989年7月	133,000	2,900,000	129億(1989年1月至6月)
1990年	/	5,000,000	超過國民收入7%

按：國營部門職工人數約1.3億。

資料來源：1990年各項數字，《經濟學人》，1990年10月20日號引用官方統計數字；其他數字，鍾斯及莫斯科夫，同，頁28-29。

可見，雖然私營部門增長率很高，它在1990年以前佔國民經濟比重微不足道。

(二)國營部門改革。1987年6月，蘇共中全會通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及《蘇聯國營企業(聯營公司)法》。(註4)《基本原則》屬於一份空泛文件，沒有實際效用。例如，價格改革原則上被肯定，但延至1991年才付諸實踐；內容為政府適當時候提價，給予低收入人士補貼。

《企業法》則作出多項具體規定。國家訂購代替生產指標，完成國家訂購任務後，企業可自銷其餘產品。按原來計劃，到1990年，國家訂購佔企業產量比重應下降至50%。但1990年的實際數字仍高達90%。(註5)換句話，企業產、供、銷方面得到的自主權十分有限。銀行發放信貸以企業盈利能力為標準，企業財政獨立，自力更生。(除增加企業留利外，這些

規定顯然屬於意願多於有實際的約束力。)土地要作價計入成本。企業增加工資和發放獎金的權限大幅提高。

(三)農業。1988年3月16日，蘇共中全會決議，土地保留為國家財產，但容許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和個人向國家租賃土地經營。租賃合同可達五十年或以上；租賃權利更可世襲。農場資產在租賃期間的增值額歸承租者所有。(註6)不過，在沒有配套措施下(例如，政府沒有為農民開闢農業物資供應渠道)，農民裹足不前，缺乏動力從事承租經營。

(四)外國投資。自1987年，蘇聯容許蘇外合資、合作經營。但由於缺乏配套措施(如沒有給予外國投資者保障)，到1990年5月，立項數目僅1,400個，投產比率低於15%，單項投資額最多不超過二百萬美元。外資以西德佔最多數，其次為美國。

※

※

※

顯而易見，直到1990年初，蘇聯經改乏善足陳。政府名義上推行耕地租賃制和容許外國投資，卻不實行配套措施，顯示它其實並不熱衷改革，改革成為一紙空文。儘管《企業法》給企業增加留利，把部份財權下放給企業，但國家訂購合同到1990年仍佔企業產值90%。這顯示中央主管部門對企業的傳統控制沒有放鬆多少。

1988年12月人大二次會議上，總理雷日科夫提交一份分兩階段實行的五年經改方案。方案以經濟市場化為目標；經濟槓桿代替行政指令；容許多種經濟成份並存。(註7)1990年中，雷日科夫政府把方案修訂，與著名的“沙塔林五百日方案”分庭抗禮。

1990年5月至1991年8月：經改方案之爭

1990年5月24日，雷日科夫向國會提交新五年經改方案。內容包括：①7月1日起，麵包價格（自1955年一直維持不變）增加兩倍；1991年1月起，多種食品及消費品大幅提價；零售價分為三類，六成半為固定價格（以食品為主），二成半設上限，其餘成半自由浮動。②把國營企業變為股份公司，1993-95年開始逐步私有化。③容許私人財產（較早之前，國會已於3月6日通過法例，批准私人擁有工廠及僱工，突破1989年12月人大二次會議迴避私人財產問題的立場）。④工資與物價指數掛勾。⑤破除壟斷。⑥中央銀行獨立。⑦放寬外國投資限制。⑧設立新稅收制度。（註8）以上方案比提交人大二次會議的方案徹底得多，確認私人財產及承認有需要把國營部門私有化。

方案公佈後，馬上引發恐慌性搶購。5月29日，國會擱置就方案進行投票；6月14日，更把討論擱置到9月（7月麵包加價因而暫緩），但授權戈爾巴喬夫利用總統行政命令著手把方案各項建議付諸實踐，包括出售國家財產、鼓勵私營企業等。

6月15日，剛於5月成為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透過親信米·博哈羅夫(MIKHAIL BOCHAROV)公佈一個“五百日”方案。按方案設計，經改分四階段進行。頭100日為準備時期，結束所有國營企業補貼，訂立私有化法例。跟著150日把國家財產私有化。再後150日把價格完全開放。最後100日通過國家投資把經濟穩定下來。（註9）

7月1日，政府批准居民開設外匯存款賬戶，容許居民在外匯店購物。8月4日，批准成立外匯市場，1991年1月1日開業，每週最少開市兩天。（按：1988年開始，隨著外貿權下放，企業及其他單位可以進行外匯調劑，由政府安排不定期交易。）1990年底，盧布有四種匯率：官方匯率（1美元兌0.56盧布），只用於統計及計算第三世界欠下蘇聯的盧布債項；遊客匯率（1美

元兌6.2盧布)；黑市匯率(當時為1美元兌25盧布)；及1990年10月底新設的商業匯率(1美元兌1.8盧布)，用於貿易和投資交易。(註10)

8月26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成立聯合委員會，研究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和重新制訂聯盟條約。委員會的焦點集中在經改問題，提出“沙塔林五百日方案”(沙塔林(STANISLAV SHATALIN)為社科院院士)。

沙塔林方案有幾個特點。一、國家財產轉移共和國，再由共和國出售。二、徵稅權下放給共和國，中央財政來源由共和國和中央政府協商決定。三、把土地私有化。四、私人財產(包括土地在內)可自由轉讓。五、建立西方銀行制度。六、各項改革大致上於同一時間推出，類似波蘭的“休克療法”。

改革分四階段進行：首99日，把國營和集體農場解散，土地轉給農民(按：根據筆者手頭資料，未能確定是有償轉讓或是無償分配)；終止企業補貼；不批准大型投資項目上馬；把國防及克格勃開支先後緊縮10%和20%，以削減財赤。第100日至第249日，加速進行私有化過程。共和國政府開始把價格放開。工資與物價掛鉤。第250至第399日，除關鍵產品如麵包、汽油等外，開放全部價格。最後101日，首三階段無可避免地會令經濟滑坡，最後階段為復甦期。500日結束後，轉到私人名下的企業應佔工業七成，佔運輸業、建造業、零售業及服務業八成。(註11)

西方傳媒強調沙塔林方案與雷日科夫方案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給予私人財產與國家財產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地位。(註12)其實，如前所述，雷日科夫方案同樣對私人財產和私有化予以承認及接受。兩個方案所不同者主要在於兩方面。首先，沙塔林方案把經濟權力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共和國。其次，雷日科夫方案主張改革循序漸進。

9月11日，戈爾巴喬夫表示支持沙塔林方案，但希望能把沙、雷兩個方案合併。同日，俄羅斯國會通過接受沙方案，決

定於11月 1日實行（由於得不到中央政府同意，這項決定終於成為一紙空文）。

在戈爾巴喬夫要求下，聯盟國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試圖把兩個方案合併，由阿甘別吉揚主持。

17日，戈爾巴喬夫態度出現反覆，公開表示土地私有化問題應由全民投票決定。24日，國會擱置經改討論，指示戈10月15日前提提交新方案。總統運用行政命令著手進行改革的授權延長至1992年3月31日。

10月初，政府向國會提交兩條銀行改革法例草案。草案建議成立向國會負責的中央銀行，董事局(BOARD OF GOVERNORS)由共和國中央銀行代表組成。(註13) 8日至10日，蘇共中全會召開，決議把小企業私有化及過渡到市場經濟。(註14)中全會對沙塔林方案加以反對。戈爾巴喬夫告訴會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不會越出「社會主義」的界限。(註15) 較早之前，戈於7月舉行的蘇共廿八大上說，過渡到市場經濟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的潛能。

10月中旬，戈向國會提交特別委員會制訂的折衷方案，名為《穩定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內容包括：放開價格，自由價格佔消費品及個人服務70%；鼓勵小型私人企業；成立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容許外資收購國內企業及按租賃制開發天然資源；削減國防及保安開支；把盧布變為可兌換貨幣等。方案措辭空泛，亦沒有明確程序表。(註16)

11月初，政府通過《蘇聯投資基礎法》(“FOUNDATIONS FOR INVESTMENT ACTIV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保障外國投資。(註17) 29日，戈爾巴喬夫在電視重申對「社會主義」的認同，表示自己雖然對私人財產予以肯定，這不包括土地在內。31日，俄羅斯國會原則上肯定把土地私有化；12月3日，附加規定，農民獲得土地後十年內不得轉讓。(註18)

1991年1月1日，政府大幅提價，價格自1962年維持不變的肉類和牛奶先後加五倍和四倍，汽油加價兩倍，卷心菜加價五

倍，魚類加價四倍半等。(註19) 月初，戈爾巴喬夫發出總統行政命令，把經營狀況差的國家土地轉給新設的土地基金，由基金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戈再一次重申他個人反對把土地私有化，認為問題應交由全民投票決定。(註20)

同月，政府把50及100盧布大額鈔票取消，希望藉以穩定盧布幣值。月中，帕夫洛夫接替去年12月25日人大會議期間心臟病突發的雷日科夫出任中央政府總理。

4月2日，政府引入三級價格體制。基本用品維持國家固定價，該日起提價20%至200%不等。耐用必須品（衣服等）設上限價。其他產品價格自由浮動。自由價格佔總數三成。據帕夫洛夫說，價格平均提升約60%。政府同時增加工資及退休金，掛鈎率為85%。(註21)

23日，國會通過帕夫洛夫提交的“反危機”經改方案。內容包括：1992年10月前把所有價格放開；把盧布變為可兌換貨幣；外商可自由匯出硬貨幣利潤；終止所有已立項但未開工的中央投資項目；1991年年底前把三分一小企業（主要為服務性企業）私有化，1992年年底前私有化比率上升至三分二；共和國可繼續把土地售予農民（但方案沒有正式對土地私有化加以肯定）；設立國家財產基金把大中型企業出售，首先出售10%；等。(註22)

同日，戈爾巴喬夫聯同九個共和國領袖（波羅的海三國、格魯吉亞、摩爾達維亞及亞美尼亞除外）發表聯合聲明，原則上支持“反危機”方案。(註23)

5月29日，戈爾巴喬夫特使耶·彼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把一份新經改方案交予布什總統顧問團。該方案以“反危機”方案為基礎，但把私有化、簽發出口許可証等權力下放給共和國，因而獲得十三個共和國支持。(註24)

6月，有份參與制訂沙塔林方案的亞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和哈佛大學一些經濟學家合作，制訂所謂“大交易”方案。18日，帕夫洛夫要求國會給予政府緊急權力，以貫

徹“反危機”方案。他批評亞夫林斯基方案為“一張漂亮的紙張”。又說“我認識一些哈佛的先生們，他們不認識我們的生活。我們不能期望他們能為我們解答所有問題。”（註25）

這期間，國會舉行閉門會議。會議上，克格勃頭頭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在談論亞夫林斯基計劃時，指責西方簽下空頭的經援支票，是為了把蘇聯社會解體。內政部長普戈（BORIS PUGO）和國防部長亞佐夫（DMITRY YAZOV）也先後批評“大交易”方案。（註26）

27日，帕夫洛夫表示亞夫林斯基方案過於依賴西方援助。（註27）（按：“大交易”方案建議西方首先挹注70億美元入一個“穩定基金”。按波蘭的經驗，以後每年所需援助可能高達300億美元。（註28））

28日，國會通過法案成立私有化部門，規定私有化範圍包括國內全部企業。7月1日，國會通過私有化法案，規定合作社在認購國營企業股權有優先權。按法案預計，到1992年年底，私有化比重佔50%；1995年達75%。（註29）8日，國會通過破產法。（註30）7月初開始，政府發放失業救濟金，首三個月給予全薪津貼，跟著六個月給予半薪津貼。（註31）

7月4日，戈爾巴喬夫表示，不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未能解決所有問題，首次顯示不完全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註32）

綜合上述，自1990年2月蘇共中全會以來，經改進度仍步履蹣跚。實際付諸實行的措施基本上限於價格改革（1991年1月及4月先後兩次提價；1991年4月引入三級價格體系）。直到八·一九政變前，系統性的私有化未起步。從“反危機”方案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儘管中央反對，共和國經已開始把土地售予農民。

政府以價格改革先行顯然是受到財政壓力影響。不論在雷日科夫1990年5月提交國會的方案，或在帕夫洛夫的“反危機”方案，價格改革的步子都比其他方面的改革為快。“反危機”方案事實上接受了沙塔林方案的價改步伐。

如前所述，雷日科夫1990年5月的方案同意把國營企業轉為股份公司，1993-95年開始逐步進行私有化。“反危機”方案把私有化速度加快，計劃1992年底把三分二小型企業出售；又打算出售10%大型企業（但沒有訂下時間表）。雷、帕兩個政府先後同意加快私有化步子，顯然是受到經濟崩潰的壓力所致。要在國家四分五裂的情況下挽回經濟，政府必須取得各個共和國，尤其是俄羅斯的合作。俄羅斯是激進改革派大本營，所以，政府只有迫於無奈就私有化問題多番讓步。另一方面，經濟崩潰加上世界力量格局的轉變，令蘇聯處於任由西方集團支配、擺佈的惡劣位置。加快私有化速度是乞求外援的先決條件。雖然雷日科夫政府和帕夫洛夫政府都不願意過於依賴西方援助，但它們亦不能不接受蘇聯經濟的命運從今開始受西方經濟體系主宰這個殘酷的現實。

“開放”、“重整”及新東歐政策的 客觀基礎

新東歐政策

蘇聯二次大戰後在東歐建立衛星國，築起緩衝長城，不僅有明顯的戰略意義，經濟上也有利用可圖。大戰嚴重創傷了蘇聯經濟。戰後，蘇聯利用東歐的資源進行經濟重建。1945年至1953年間，透過赤裸的經濟掠奪，大量財富從東歐轉移到蘇聯。主要掠奪形式有：賠款（例如，五十年代初期，東德國民收入近五分一用作賠償給蘇聯）；蘇聯以低於世界市場價格輸入東歐產品；等。應當留意，以上掠奪不單只影響二次大戰期間支持希特拉的東德、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捷克和波蘭一樣要在槍口下提供奉獻。這種赤裸的剝奪性經濟關係一直維持到五十年代中葉。（註1）

斯大林1953年逝世，蘇聯對東歐的控制稍為放鬆。1955年，蘇聯與南斯拉夫修好，間接承認各國可依循不同道路建立「社會主義」。同年，蘇聯為防止非衛星化失控，成立華約組織，加強成立於1949年但一直不活躍的經互會的功能。（註2）

原本，蘇聯希望透過經互會令東歐各國進行經濟分工，最終把蘇聯、東歐的經濟一體化。但東歐各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仿效蘇聯，建立自力更生的斯大林模式。六十年代初，各國基本工業化大致完成，工業技術水平尤勝蘇聯。東歐各國一般缺乏天然資源（羅馬尼亞和波蘭情況較好），於是乎，蘇聯變成東歐的能源和原料供應來源，以及為東歐的工業品提供廣闊的市場。

1958年，經互會達成協議，以所謂“布加勒斯特”原則作為會內貿易訂價標準。會內貿易價格每五年修訂一次，根據前五年的世界市場價格訂定。“布加勒斯特”原則一直維持到

1974年底。1973-74年首次石油危機令能源和原料價格飛漲。蘇聯為減低因會內貿易價格與世界市場價格差額所帶來的損失，於1975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經互會執委會，修改會內貿易訂價準則。會議以“莫斯科”原則代替“布加勒斯特”原則。按新原則，會內貿易價格改為每年修訂一次，但同樣以前五年的世界市場價格為依據（1975年除外，該年以1972-74三年的世界市場價格為準）。“莫斯科”原則的功用在於把上述兩種價格的差距拉近。（註3）

根據大部份專家的意見，自1960年開始，蘇聯一直給予東歐「隱藏」的經濟津貼。東歐各國向蘇聯出口的工業品一般被稱作“軟貨品”。意思是這些產品中大部份在西方市場缺乏競爭能力。蘇聯向東歐出口的能源產品及原料一般被稱為“硬貨品”。這是指它們在西方市場出售絕對不成問題。六十年代初以來，蘇聯一向以高於同類產品的世界市場價格購買東歐的“軟貨品”，同時又以低於同類產品的世界市場價格給東歐出售“硬貨品”。出於這種會內貿易和世界市場之間的價差，蘇聯無形中給予東歐「隱藏」的津貼。

這種津貼在六十年代數量有限；但能源產品及原料在七十年代漲價，令津貼以倍數標增。“莫斯科”原則代替“布加勒斯特”原則後，會內貿易價格與世界市場價格差距一度縮窄。但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按：1980年石油價格為1978年價格兩倍半）再一度把差距拉開。事實上，蘇聯並沒有充份利用“莫斯科”原則。根據西方專家計算，按“莫斯科”原則，蘇聯1975-80年對東歐的進出口比價應上升40%，但實際上升只得17%至25%（不同專家的計算有一定出入）。（註4）蘇聯對東歐的石油出口價格始終低出世界市場價格一大截。例如，會內貿易石油價格在1979年6月相等於世界市場價格73.5%至81.7%；1979年12月相等於56.1%至62.3%；1980年11月更低至48.4%。（註5）

一些東歐經濟學家在六十年代下半葉開始承認東歐在經互

會貿易中得到蘇聯津貼。例如，匈牙利經濟學者歐殊（SANDOR AUSCH）1972年指出：

“對照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比價關係，經互會的比價關係顯然對工業原料及／或農產品淨出口國家不利（……），對工業制成品出口國家有利（……）。”（註6）

蘇聯官員七十年代末開始在經互會會議和其他官方場合上把「隱藏」津貼問題攤出來。（註7） 值得注意，雖然東歐六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差異，但在它們相互間的貿易，“硬貨品”和“軟貨品”大致平衡。（註8）

從以上可見，不論蘇聯或東歐六國，都對於「隱藏」津貼的存在有充份自覺。

以下是津貼的詳細數字（表24.1至表24.4）。

顯而易見，按絕對數額計，東歐六國得益最大的是東德，然後順序為捷克、波蘭、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非但得不到任何好處，更相反要倒貼（儘管數額有限）。七十年代中葉開始，保加利亞得到的津貼急升，超過匈牙利及波蘭，直追捷克。按人均計算，次序為：東德、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波蘭及羅馬尼亞（按：波蘭人口比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先後多3.8和3.2倍）。

據估計，蘇聯1979年及1980年給東歐的「隱藏」貿易津貼先後達104億美元及178億美元（按當年價格計），分別佔蘇聯該兩年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總額47%和70%。（註9）

按1980年現時價值計算，蘇聯自1960年到1980年給東歐的「隱藏」貿易津貼達872億美元。（註10）其中1971-80年佔755億（87%）。（註11）如前所述，蘇聯1980年硬貨幣外債（淨額）為96億美元；即使由於1988年開放外貿而有所急升，1990年的水平亦不過為430億。換句話，假使蘇聯改為與西方貿易，它的經濟環境肯定會大為改善。

附帶一筆，一向以來，經互會內部不存在資本輸出。（註12）1975年，經互會會議通過十個合作投資項目，總投資額90億盧布

表24.1：「隱藏」貿易津貼佔蘇聯對東歐出口總額比率(1960-78)(年均百分比)

保加利亞	4.7
捷克	19.9
東德	28.8
匈牙利	22.3
波蘭	15.7
羅馬尼亞	-4.8
東歐六國總數	17.6

資料來源：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48。

表24.2：「隱藏」貿易津貼額，1960-78(1970年不變價格計)

	總額(百萬美元)	人均(美元)
保加利亞	1670.6	10.4
捷克	4426.0	16.3
東德	8748.4	27.0
匈牙利	2891.3	15.2
波蘭	3755.0	6.1
羅馬尼亞	-145.0	-0.4
東歐六國總數	21346.3	10.9

資料來源：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48及50。

表24.3：東歐六國佔「隱藏」津貼總額比率，
1960-78(%)

保加利亞	7.8
捷克	20.7
東德	41.0
匈牙利	13.6
波蘭	17.6
羅馬尼亞	-0.7
東歐六國總數	100.0

資料來源：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48。

表24.4：「隱藏」貿易津貼額，1960-78
(1980年現時價值(PRESENT VALUE)計)

	總額(百萬美元)	人均(美元)
保加利亞	4633.0	28.7
捷克	12016.1	44.1
東德	23694.2	73.1
匈牙利	7816.8	41.1
波蘭	10113.7	16.1
羅馬尼亞	-530.8	-1.4
東歐六國總數	57743.2	29.5

資料來源：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50。

，東歐各國佔34億，其中九成用於興建烏拉山柯倫堡(ORENBURG)到東歐的天然氣管及烏克蘭到匈牙利的電纜。施工期由1976年到1980年。1981年，經互會再通過 1981-85年五個項目，同樣涉及開發蘇聯天然資源，供應東歐。(註13)

東歐出資採取實物形式(即供應資本貨財)，但折回盧布當作信貸計算。蘇聯亦以實物方式還債(即供應有關項目所開發的能源和原料)。蘇聯並保證還債期滿後，繼續維持供應。雖然以上項目規模龐大，以 1976-80年計，它們佔東歐各國總投資額平均僅約3%。

由於東歐提供的信貸名義上的利息率低，很多人不其然認為蘇聯佔了很大便宜。但據一些西方專家就柯倫堡天然氣管的投資計算，對照於西方同類項目的回報率，東歐國家的投資屬於有利可圖。事實上，一些東歐經濟學家也認為這些投資化算。

綜合而論，七十年代中興起的合作投資(這類投資八十年代中葉結束)沒有影響上文關於蘇聯經濟上津貼東歐的分析。

蘇聯給東歐津貼，是換取政治、戰略和意識形態上的利益的代價。(註14)表24.1至24.4顯示，羅馬尼亞要倒貼蘇聯。七十年代末，蘇聯容許保加利亞以盧布按津貼價購入大量蘇聯原油，甚至比它國內耗用所需為多。保加利亞在1979年竟能因此而把從蘇聯輸入的原油及油產品剩餘的部份向硬貨幣市場輸出，使保國硬貨幣收支平衡顯著改善。相反，幾經羅馬尼亞多年苦苦哀求下，蘇聯1980年僅同意向它輸出150萬公噸原油(不足羅馬尼亞所需10%)，並規定以美元付款。為什麼羅國和保國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眾所周知，羅馬尼亞一向不容許蘇聯過問其外交政策。1958年6月後，蘇聯不再駐軍羅國。1967年，羅國部隊終止參加華約集團軍事演習。華約1968年鎮壓布拉格之春，羅國部隊拒絕參加，羅國政府更公開譴責鎮壓。(註15)

東歐各國對蘇聯的價值可分幾方面考慮。一、戰略價值。這方面的因素包括：位置(一般而言，華約北面防線較南面為重要，其中東德接壤北約邊界最長，達856英哩；捷克亦有237

英哩邊界與西德接壤)；軍事基地數目；蘇聯駐軍人數；代蘇聯派兵到世界其他地方活動(如東德派兵往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亞等地)；等。二、政治價值：在國際組織和場合支持蘇聯的程度；經互會內擁護蘇行使支配權的程度；官方(包括傳媒)給予蘇聯多少支持等。三、意識形態上的價值：對異己思想、力量的箝制；對私營經濟的態度等。除上述外，各國工業結構切合蘇聯進口需要的程度也列入蘇聯考慮範圍。

戰略價值上，東歐五國(不計羅馬尼亞)對蘇聯的重要性先後次序為：東、捷、波、匈、保。政治價值次序：保、東、匈、捷、波。意識形態價值次序：保、東、捷、匈、波。經濟價值：東、捷、保、匈、波。

綜合而言，東德對蘇聯的價值最高，波蘭最低。這與蘇聯給各國的人均「隱藏」津貼數量多少次序中東德排行第一，波蘭最尾完全吻合。匈牙利的綜合價值排第四，它得到的總額及人均「隱藏」津貼數量均排第三。但單獨以1974-78年這段期間計，無論按總額或人均計，匈牙利均被保加利亞趕過，跌至第四位。(註16)由於無法判斷蘇聯給予戰略等各方面的考慮什麼相對比重，我們很難為保加利亞和捷克對蘇聯的綜合價值分高低。如前所述，無論按總額或按人均額計算，捷克得到的「隱藏」津貼都排行第二；而自七十年代中葉，保加利亞排行第三，按人均額計，更趕過東德，登上榜首。(註17)看來，戰略和經濟因素考慮對蘇聯較政治和意識形態為重要。

前面指出，蘇聯和東歐各國都清楚知道「隱藏」貿易津貼的存在。津貼數量與各國對蘇聯的整體價值成正比，顯示蘇聯是自覺地以經濟代價來換取戰略上、政治上等方面的利益。

綜合上述，四十年代下半葉及五十年代，蘇聯曾對東歐進行經濟剝削，但剝削方式與西方帝國主義不同，以原始的掠奪形態出現。五十年末葉、六十年代開始，上述剝削結束。自此，東歐對蘇聯的價值在於戰略、政治、意識形態及進口需要各方面的意義上。作為代價，蘇聯開始給予各國「隱藏」貿易

津貼，但為數不多。

七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令原油、油產品及原料價格暴漲，「隱藏」津貼額標升。為減輕津貼壓力，蘇聯以“莫斯科”原則代替“布加勒斯特”原則；同時開始相對減少給東歐的供應，以增加對硬貨幣市場輸出，迫使東歐對西方市場的依賴相對上升。以原油為例，1971-75年間，蘇聯對東歐的輸出年均增長率為9.5%。1976-80年間，下降至4.5%。1980年經互會會議上，蘇聯告訴東歐各國，1981-85年間，年均增長率將再降至低於4%。（註18）（按：東歐市場約佔蘇聯石油出口一半。）

儘管這樣，蘇聯仍然願意繼續以「隱藏」津貼來換取上述各方面的利益。但在經濟增長放緩趨向無法扭轉下，這些津貼愈加令蘇聯不勝負荷。

1981年，波蘭政府在蘇聯催促下鎮壓團結工會，經濟陷入谷底，又被西方國家嚴厲制裁。波蘭滿足了蘇聯的政治要求，蘇聯自然要為此而付出沉重經濟代價，向波蘭提供大量經濟援助。波蘭經驗告訴蘇聯，它已經再沒有經濟力量置東歐於自己的嚴緊控制底下。

顯然，踏入八十年代中葉，蘇聯清楚認識到，以前利用經濟援助及「隱藏」津貼換取東歐的政治忠誠的年代已經消逝。為挽救自己經濟，蘇聯必須削減上述津貼及援助。這樣，蘇聯就得容許東歐各國擁有更大的政治自主權。1956年、1968年和1981年對東歐進行直接或間接軍事干預的日子已成歷史陳跡。

戈爾巴喬夫和謝雅爾德納澤的新東歐政策便是以上經濟形勢的產物，而非什麼開不開明的問題。再者，如下文分析，新東歐政策與“開放”政策及“重整”政策也互相配合。

“開放”及“重整”

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經改一無建樹，這點上文已論及。有

一種意見認為他應該學習中國改革策略，先從農業著手，解決人民溫飽問題，這樣，什麼其他事情也易辦得多。（這是中國輿論的一般看法，當然有一定政治宣傳成份。）這個看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卻把問題太簡單化了。別於中國，蘇聯農業以大規模生產為主，機械化程度高出中國很多。中國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個體農戶分田單幹，在蘇聯似乎行不通。

另一方面，蘇聯八十年代中葉面對的客觀環境與中國1979年實行開放改革時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別於蘇聯，中國不用給任何衛星國家龐大「隱藏」津貼；也不用承擔外地駐軍開支；亦沒有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所以，戈爾巴喬夫選擇了異於中國的改革道路，有一定的客觀基礎。當然，必然（客觀）當中也有偶然（主觀）因素，影響著必然的發生的節奏和形態。戈及其親信經改失誤、不力、交白卷，他們難辭其咎。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們選擇以政治改革行頭是受到上述客觀因素所驅使。

根據蘇聯前國防部長 亞佐夫說，蘇聯1988年軍費開支為773億盧布。（註19）該年淨物質生產為6,250億盧布。（註20）換句話，軍費佔12.4%。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由於蘇聯官方數字沒有把一些應該列入軍費開支的項目計算在內，真正的比率約為15%至17%。（註21）這個比率較美國及西歐平均水平先後高出一倍和四倍。（註22）按一位蘇聯經濟學家1990年4月訪問美國時說，中情局的估計仍屬偏低，準確比率為20%至25%。（註23）

戈爾巴喬夫以為，只要結束軍備競賽、只要大幅削減東歐的負擔（「隱藏」津貼和軍費開支），蘇聯經濟便能重獲新生（按：如前分析，美國七十年代末重新把軍備競賽升級，令蘇聯在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之同時，需要相對上緊縮消費）。況且，西方的「微型軟件」革命使蘇聯軍事科技上也落後愈來愈遠。列根提出“星戰計劃”，蘇聯深諳它沒有可能在競賽中跟上西方。於是，戈提出他的所謂“新思維”，建議結束冷戰。停止對東歐進行不為西方所容的干預是一個一石二鳥的辦法。

這政策既是結束冷戰的必要條件，也同時是減輕東歐的經濟負擔的必然結果。除停止上述干預外，戈必須要能夠說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蘇聯已進入一個嶄新時代，令它們安心裁減軍備。戈的策略是爭取西方民間輿論，形成促使西方國家政府願意與蘇聯談判大量裁軍的壓力。為此，戈提出“開放”及“重整”兩個政策，把蘇聯政治和社會生活放開、活躍，謀求為蘇聯在西方人心目中樹立一個全新的酷愛和平的形象。

1986年4月，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發生空前意外。政治局不願意把消息開放。甚至連有“開放”政策總設計師之稱的亞科夫列夫事後也為政治局的決定辯護。（註24）但紙沒法包得住火。西歐國家的氣象局很快便探測到大量輻射。終於，在意外發生整整三個星期後，戈爾巴喬夫親身上電視向人民作出報告。

切爾諾貝爾事件的處理手法對戈爾巴喬夫意圖為蘇聯建立一個全新的“開放”形象的努力構成一個沉重打擊。為收復失地，如前所述，亞科夫列夫把“開放”政策的步伐猛然加快。

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1985年7月2日便解除有份扶持他的葛羅米柯的外長職務，由謝雅爾德納澤接替，標誌新外交政策、路線的開始。

1987年12月8日，戈爾巴喬夫與列根在華盛頓舉行第三次高峰會，簽署中程核子導彈條約。1988年5月18日，首批阿富汗撤軍返抵蘇聯。據雷日科夫1989年6月向人大報告，阿富汗戰爭共耗費700億美元。（註25）1988年12月7日，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發言，宣佈蘇聯單方面裁減華約集團東歐駐軍50萬（約為總數12%）。

1989年1月，政府宣佈計劃把價值5,000億盧布的軍事器材、物資轉為民用，成立特別委員會就有關問題進行研究。（註26）2月，阿富汗撤軍全部完成。3月，裁減歐洲常規軍備談判展開。5月，美國國務卿貝克訪問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就裁減歐洲常規軍備提出新建議，並宣佈無條件削減短程導彈500

枚（佔總數5%）。（註27）

6月，亞佐夫宣佈1989年削減國防開支8.2%及削減軍備生產19.5%。（註28）7月，布達佩斯華約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正式宣判勃列日涅夫主義（註29）死刑：

“每一個民族決定自己國家的前途，選擇自己的社會形態。無論借口是什麼，外來干預都不能容許。”

會議通過決議，不容許集團部隊干預成員國內政。（按：此前，戈爾巴喬夫已首肯匈牙利實行多黨制和波蘭把團結工會合法化及舉行半自由選舉。）

10月7日，東德四十周年國慶，戈爾巴喬夫、齊奧塞斯庫及其他東歐元首均有出席。齊奧塞斯庫向各人表示匈牙利和波蘭的轉變會繼續蔓延，建議華約進行壓制，甚至表示羅馬尼亞會不惜單獨派遣軍隊進入波蘭。戈馬上表明立場，警告各人不得進行鎮壓。（註30）戈顯然恐怕任何鎮壓行動都會令他消除冷戰的努力毀於一旦。在與昂納克的私人會面中，戈向昂施加壓力，告訴他必須跟隨蘇聯進行改革（按：昂不僅在國內抱殘守缺，更曾試圖干預蘇聯的改革）。（註31）

10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言人基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在赫爾辛基重申：

“勃列日涅夫主義經已壽終正寢……你知道法蘭·仙納杜拉「我的道路」這首歌嗎？匈牙利及波蘭選擇了它們自己的道路。現在我們信奉仙納杜拉主義。”

11月初，華約集團會議間接譴責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鎮壓。（註32）

12月，戈爾巴喬夫就裁減歐洲常規軍備作出新的讓步。（註33）戈多番主動作出讓步當然是迫於經濟形勢，但應當留意，東歐發生的變化告訴蘇聯，即使它不自動裁減華約部隊，東歐各國也會要求蘇聯撤軍。1990年1月9日，捷克要求所有蘇聯駐軍該年年底前撤走。18日，匈牙利及波蘭提出類似要求。隨後，東德民主社會主義黨（即前共黨）領導人居西（GYSI）要求

所有外國部隊1999年前全部撤離東、西德。(註34)

1989年12月20日，蘇聯向美國建議展開短程核導彈談判。

1990年1月，戈爾巴喬夫首次公開表示兩德統一乃勢所必然。月中，經互會四十五次會議在保加利亞索非亞召開，蘇聯要求由1991年1月1日起，經互會內部貿易全部改為現匯貿易(以硬貨幣付款)，代替記賬貿易。

2月16日，蘇聯和美國就中歐裁軍數目達成協議，北約、華約各方部隊以195,000人為上限(但英國可額外駐軍30,000)。同日，基拉西莫夫(當時已調職為外交部發言人)指出，蘇聯同意讓北約佔便宜，因為一兩年後，這些上限數目會失去所有意義。他說“若果你們(按：指北約)希望駐紮額外部隊，付款的是你們的納稅人。”

2月26日，首批駐捷克蘇軍撤離。撤軍分三階段進行，1991年6月31日全部完成。

6月2日，蘇聯和美國在華盛頓高峰會簽署裁減戰略武器(按：即長程核導彈)條約初步協議(PRELIMINARY ACCORD)，雙方原則上同意削減三分一彈頭，但不限制進行技術改良。(註35) 同一高峰會上，雙方簽署裁減化學武器條約，規定雙方由1992年至2002年把超過5,000噸以上的所有化學武器毀滅。

7日，華約發表聲明，正式宣佈冷戰結束，成立特別委員會研究集團前途問題。(註36) (此前，4月9日，匈牙利、捷克和波蘭，聯同奧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召開會議，商討建立新關係，以代替華約集團和經互會。)29日，《真理報》正式公佈經互會貿易1991年1月1日起全部以硬貨幣付款。

7月16日，西德答應給予龐大經援後，戈爾巴喬夫表示接受統一後的德國參加北約。

9月29日，總統發言人日尼丹科(VITALY IGNATENKO)表示，1985-90年間，轉作民用的軍事用品價值1,350億盧布；政府計劃未來五年把550個兵工廠轉作民用，產品價值達2,700億盧布。

10月初，蘇聯國會批准先後於1974年和1976年與美國簽署的試驗禁制條約(THRESHOLD TEST BAN TREATY)及非軍事核爆炸條約(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S TREATY)。兩條條約均涉及限制核試，由於檢查雙方有否遵守條約規定存在技術困難，兩國國會一直沒有加以批准。(註37)

10月4日，貝克和謝雅德納澤宣佈裁減歐洲常規軍備條約將於11月簽署。

22日，哈維爾建議廢除華約統一指揮系統。11月初，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要求盡快把華約廢除。蘇聯表示同意結束華約軍事架構，但建議保留一個政治協商委員會。

11月19日，裁減歐洲常規軍備條約正式在歐洲安全及合作會議會議上簽署。(註38)

1991年1月1日，經互會開始進行現匯貿易。結果，蘇聯對東歐出口1991年首季下降41%（主要由於蘇聯把石油改在西方市場出售），從東歐進口下降48%。其中捷克與蘇聯貿易竟猛跌四分三。(註39)

2月12日，蘇聯同意由四月起把華約軍事架構解散。(註40) 17日，美蘇宣佈裁減戰略武器條約將於6月底簽署。(註41) 25日，華約六國(東歐五國——西德統一後由六國減為五國——加蘇聯)在布達佩斯會議正式宣佈4月1日起自行解散，但應蘇聯要求，成立一個政治協商委員會。(註42)

5月18日，經互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決定6月28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註43) 6月16日，蘇聯早原定兩個星期完成自匈牙利撤軍。19日，最後917名蘇軍及眷屬撤離捷克。28日，經互會最後一次會議在達佩斯召開，決議9月正式解散。(註44)

7月1日，華約政治協商委員會在布拉格會議上宣佈解散。(註45)

7月31日，美蘇在莫斯科高峰會簽訂裁減戰略武器條約。(註46)

“新思維”的如意算盤如何出錯

應當承認，戈爾巴喬夫為蘇聯在西方人心目中樹立新形象這方面的工作成績斐然。戈本人更成為西方人，尤其是年青一輩的寵兒。加上蘇聯在裁軍談判多番主動單方面作出無條件或最低限度一面倒的讓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終於同意結束冷戰，裁軍談判得以順利開展。

但戈爾巴喬夫的如意算盤卻計算錯誤。結束軍備競賽對紓緩經濟壓力或甚至挽回經濟所起的作用，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發揮出來。首先，裁軍談判本身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第二，除了運輸器材、工具等少數軍用品外，裁減了的軍備轉為民用有很大困難。第三，兵工廠轉為民用同樣比想象複雜得多。（註47）

削減給東歐的津貼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得到。假使東歐1989年末沒有出現突變，蘇聯能否在戈上台近六年後於1991年1月開始把經互會貿易改為以硬貨幣付款，是一個疑問。

戈為消除冷戰所付出的代價可就大了。“開放”、“重整”和新東歐政策如何把蘇聯經濟推向崩潰這點，第廿二章已有所論及。其實，戈大可以單方面結束軍備競賽，這樣，他便不用冒進地付出以上代價。倘使他在經改又有所建樹，蘇聯肯定不會淪落到今天的地步（當然，蘇聯國力相對上削弱這個必然發展不以主觀政策上的得失為轉移，但問題是如何左右必然發展的節奏）。不過，戈不願意自動放棄軍事上與美國鼎足而立的超級大國地位。他希望通過裁軍談判，在結束軍備競賽的同時，保留蘇聯的國際位置。可惜，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到頭來反而令蘇聯淪為西方的附庸。

戈1989年初對匈牙利決定實行多黨制和波蘭給團結工會讓出部份權力加以首肯時，斷不可能預料到局勢會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上文指出，匈共當時仍有十足信心有足夠的力量領導聯合政府；而根據波蘭圓桌會議協定，由雅魯澤爾斯基出任總統，波共組織聯合政府似成定局。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波、匈變局，加上戈爾巴喬夫不干預兩國的政策，產生了一個相輔相承的循環，猛然加速事態發展的地步。匈局和蘇聯的不干預促使波共衛星黨掙脫波共控制，終於導致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這又反過來促使匈共10月7日自行解散（團結工會政府成立表示，匈共不改頭換面，它肯定無法維持先前的民意優勢，贏出大選的機會便會因此而幻滅）。

戈爾巴喬夫10月7日參加東德四十周年國慶紀念活動時，仍沒有意識到波、匈兩國變局已把整個東歐形勢推到一個關鍵性的臨界點。如前所述，對於匈牙利所一手炮製出來的東德逃亡潮，戈爾巴喬夫視若無睹。

一個歷史觸角和政治敏銳性較強的人應該看得到，波、匈變局和蘇聯新東歐政策對東歐其他國家會產生的震撼性作用。（齊奧塞斯庫這方面的洞見力顯然較戈為優勝。）從蘇聯利益出發，東歐其他國家出現突變對蘇聯沒有好處。戈爾巴喬夫和謝雅爾德納澤亦不會希望後來事實上出現了的突變發生。但戈、謝不僅沒有就東德逃亡潮事件進行幕後介入，相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竟然有份策劃捷克的所謂“11月27日屠殺”。在八月（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到十月這段歷史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和謝雅爾德納澤似乎毫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指對蘇聯而言）。

蘇聯軍方強硬派指責戈爾巴喬夫及謝雅爾德納澤雙手把東歐奉送給西方集團，有一定道理。謝氏反駁指軍事干預的時代已過，是混淆視聽、推卸責任的論調。因為干預沒有一定需要採取軍事方式。不論經濟上或政治上，蘇聯對東歐的發展仍能發揮一定的影響。但戈、謝卻無條件自動投降。西方傳媒把兩人神化、美化，不過是由於他們的投降政策有利於西方罷了。

東歐出現突變令“開放”及“重整”政策所製造出來的社會不穩定火上加油，終於使蘇聯陷入全面解體、崩潰狀態。

總結而言，戈爾巴喬夫為求結束軍備競賽作為挽回蘇聯經濟的手段，以“開放”、“重整”和新東歐政策行頭的策略，

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蘇聯國際地位走下坡是經濟邏輯的必然結果。但這個必然發展到現今地步，戈爾巴喬夫和他一班親信要需承擔主觀因素在歷史上可發揮的作用的全部責任。

蘇聯政局發展

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上台伊始，4月便召開中全會提出“加速戰略”。1986年2月黨廿七大對“加速戰略”加以肯定，計劃國民收入十五年內翻一番（即年均增長率為4.7%）。大會同時提出“開放”及“結構重整”兩個口號。上文指出，蘇聯淨物質生產1976-80年平均每年增長4.4%，1981-85年下降至3.5%。在未有任何具體經改方案之前（口號當然不足夠）便以為可以把十年來的頹勢馬上扭轉，戈好大喜功之傾向可見一斑。

上文指出，在亞科夫列夫策動下，“開放”政策於切爾諾貝爾事件後加速發展。這引致利加喬夫極大不滿。

1987年10月，中委會通過決議，11月把葉利欽開除出政治局，革除他莫斯科黨魁職位。（戈上台後，指使利加喬夫在莫斯科做手腳，把莫斯科黨魁基里辛（GRISHIN）趕下台，由葉代替。）

1988年3月18日，戈爾巴喬夫正在南斯拉夫進行為期五天的訪問，《俄羅斯蘇維埃報》（SOVETSKAYA ROSSIYA）刊登署名文章，對“開放”政策1986年以來的發展加以猛烈抨擊，指責它背叛「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作者為一名不見經傳的女黨員蓮·安德魯艾娃（NINA ANDREYEVA）。文章經由《俄羅斯蘇維埃報》總編輯華·捷金（VALENTIN CHIKIN）和利加喬夫批准。利加喬夫召集各報章和電子傳媒領導人，對文章加以肯定，指示各人予以轉載。那幾日間，《真理報》兩次把利加喬夫列作黨第一把手，全國各地黨組織紛紛召開會議，討論文章所提出的問題。（註1）

顯然，以上屬於一次政變企圖。戈爾巴喬夫回國後，馬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一連舉行兩天，戈要求各人逐一表態是

否繼續擁護他出任總書記，終能化險為夷，擊退利加喬夫的突襲。利加喬夫出師不利，反而被剝奪控制意識形態的權力。(註2)利加喬夫所代表的新一代保守派無功而返，與他們缺乏經改班子和方案有密切關係。

1988年6月，第十九次特別黨代表會議召開(這是五十年來首次黨代表會議)。會議舉行前及期間，政府容許市民進行六十年來首次合法遊行示威。示威者要求代表們支持戈爾巴喬夫的“開放”及“結構重整”政策。會議原則性通過成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修訂憲法的超級國會)，透過差額選舉產生。表決結束後，戈爾巴喬夫突然宣佈首屆選舉將於一年內舉行，很多代表大為詫異。(註3)

1989年3月26日，人大選舉舉行。2,250議席中，三分之一(750席)預留給官方推舉候選人，其餘公開競逐。任何人得到500名選民提名便能登記為候選人。競選結果，不少共產黨高層領導敗北，如列寧格勒黨魁尤·梳羅夫可夫(YURI SOLOVYOV)(雖沒有對手，但所得票數少於所需的50%而落選)、莫斯科、基輔等主要城市市長等。地區黨領袖中近三分一失利。雖然共產黨員仍佔據所有席位85%，蘇共的威信受到極大的創傷。

5月25日，人大首次會議召開，會議情況上文已有所論述。會議選出544席位的最高蘇維埃(即國會)。包括葉利欽在內的激進改革派紛紛落選。一名西伯利亞大學教授亞·卡山力赫(ALEXEI KAZANNIK)自動把席位讓給葉利欽，經大會批准，葉欣然接受。

7月，蘇聯爆發1917-21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運動，自西伯利亞的庫爾巴斯(KUZBASS)至烏克蘭的頓巴斯(DONBASS)，罷工礦工使經濟陷入癱瘓。總理雷日科夫向自發罷工委員會代表作出加薪等承諾後，事態方平息下來。

月底，葉利欽、薩哈洛夫等人聯同269個人大代表成立區域代表聯合會(INTER-REGIONAL GROUP)，出版《人民代表》(NARODNY DEPUTAT)。區聯會綱領(草案)包括政治多元化、廢

除《憲法》第六條(該條款保障共黨領導地位,1977年寫入《憲法》)等。

11月,國會以198票贊成,173票反對,28票棄權,兩票之微否決在將於12月舉行的人大二次會議議程加上辯論《憲法》第六條。(註4)

12月初,立陶宛國會把反對派政黨合法化。12月中旬,人大二次會議召開,以839票贊成,1138票反對,56票棄權反對就《憲法》第六條進行辯論。戈爾巴喬夫本人反對廢除第六條。(註5)如前分析,東德和保加利亞先後於12月7日和12日肯定多黨制選舉的發展,來不及影響戈爾巴喬夫和他的追隨者的取態。

1990年1月21日,區聯會發表《民主綱領》(DEMOCRATIC PLATFORM),內容以上述草案為基礎。

2月7日,蘇共中全會召開,通過黨綱修訂草案。草案重申對馬、恩、列加以肯定,但廢除一黨專政:“社會發展不排除成立政黨的可能性。成立政黨的方法將由法律規定,在蘇聯《憲法》得到反映。”全會又通過改組政治局,建議以主席團代替,成員包括15個加盟共和國黨領袖。(註6)

全會上,利加喬夫表示反對私有化,建議問題應由全民投票決定。

27日,國會以306票贊成,65票反對通過設立總統職位,把人大三次會議提前於3月召開,以便修訂《憲法》。(此前,戈國家元首地位基於他為最高蘇維埃主席。)按建議,總統六年一任,首屆由人大選出,以後經由全民直選產生。權力包括:總理和其他政府首長的任免由總統向國會提名;對國會通過的法例擁有否決權,如國會三分二票數推翻否決,可把法案交由人大作最後決定;可在全國任何地區宣佈緊急狀態,不用經由地區國會同意;發出行政命令,效力與法例相同;有需要時取消加盟共和國國會通過的法例(這項權力以前屬於國會主席團所有)。此外,總統設立總統會議。(註7)

戈爾巴喬夫設立總統職位的用意一方面是為了應付分裂主

義的冒升，另一方面是希望繞過國會和蘇共中全會的保守勢力。
(註8) 設立總統會議和實行行政命令統治有架空總理和部長會議(內閣)之意圖。

3月12日至14日，人大三次特別會議召開。13日，會議以1,771對164票(74票棄權)廢除《憲法》第六條。以1817對133票(61票棄權)通過設立總統職位，但對部份建議作出修訂：總統行政命令必須符合《憲法》和現有法例；國會以超過三分二票數推翻總統否決，總統不能交由人大作最後決定；緊急狀態令必須得到受影響地區國會或聯盟國會三分二票數通過；總統任期改為五年一任。戈爾巴喬夫、部長會議和國會的意圖受到一定挫折。會議以1,329對495票選出戈爾巴喬夫為首任總統，最高蘇維埃主席位置由盧基揚洛夫接任。(註9)

在國家走向瓦解的形勢下，國會和人大接納了設立總統職位的建議。繼成立經由差額選舉產生的人大的決定之後，這是另一個影響至為深遠的決定。共產黨的權力結構上被架空的發展，現在又增添了新動力。八·一九政變流產後，表面上仍有相當實力的共產黨原來已變成外強中乾，不堪一擊。

3月11日，戈爾巴喬夫在中全會上反對更改蘇共黨名。(註10) 4月初，利加喬夫公開呼籲進行清黨，把分裂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開除。11日，中全會發表聲明，既抨擊反對改革的聲音，又批判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列寧主義」的傾向。

4月，官方工會《勞動報》(TRUD)要求在未得到人民同意前，政府不應實行向人民生活水準開刀的經濟改革。(註11) 利加喬夫和巴卡京成立“馬克思主義綱領”派系。(註12)

5月1日，激進反對派在勞動節慶祝活動中進行反宣傳。列寧格勒的慶祝遊行被示威者搗亂。(註13) 反對派在莫斯科舉行反共遊行，高舉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葉利欽的畫像，又揮舞立陶宛國旗。“打倒列寧”、“打倒共產黨”、“打倒戈爾巴喬夫”的標語鋪天蓋地。戈爾巴喬夫及其他黨政領導人被喝倒采。“辭職！”、“罪犯！”等口號不絕於耳。(註14)

5月，俄羅斯國會舉行俄羅斯總統選舉。首輪投票中，葉利欽贏得497票，保守分子波洛茲科夫(IVAN POLOZKOV)473票。次輪投票結果，葉得到503票，波458票，葉仍未能獲得多過半數。(註15) 第三輪投票，葉終以535票，4票之微當選。(註16) 波領導的“俄羅斯共產黨人”(“COMMUNISTS OF RUSSIA”)派系在俄羅斯國會有一定實力，到1991年中，仍佔據約四分之一議席。(註17)

6月中旬，列寧格勒黨魁域·泰柯爾堅(VIKTOR TYURKIN)表示應把戈爾巴喬夫和亞科夫列夫開除出黨。15日，煤礦工人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原則上通過決議成立獨立工會。同日，葉利欽親密盟友博哈洛夫在俄羅斯國會總理競選中失利，總理一職由中央政府副總理西拉耶夫(IVAN SILAYEV)奪得。(註18)

18日，利加喬夫要求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全民投票。19日，俄羅斯共產黨召開成立大會(此前，其他14個加盟共和國均有共和國共產黨，唯獨俄羅斯除外)。多位代表猛烈抨擊戈爾巴喬夫聯同總統會議，在沒有徵詢政治局或中委會前，便自行決定市場化經改和同意兩德統一。代表對戈爾巴喬夫和謝雅爾德納澤任由西方集團把蘇聯趕出東歐表示強烈不滿。利加喬夫要求戈辭去總書記職位。波洛茲科夫反對戈建議黨放開對經濟的控制，贏得熱烈掌聲；但他認為戈應該留任總書記。大會以1,396對1,066票選波為俄共第一書記。

27日，謝雅爾德納澤在《真理報》為自己的東歐政策辯護，指鎮壓時代已過。

7月2日，蘇共廿八大召開(原定1991年3月舉行，後提前至1990年10月，復提早到7月)。利加喬夫抨擊“不加思索的激進主義”；表示反對私有化；警告改革不得越出「馬列主義」路線；但支持由戈爾巴喬夫連任黨領袖。伊·米古連(IVAN MIKULIN)少將對蘇聯被逐出東歐表示極大憤怒。(註19)

6日，葉利欽要求黨轉變為社會民主黨。12日，葉利欽、索布恰克、波波夫(莫斯科市長)等領導的“民主綱領”派近

100黨員退黨。

大會以3,411對1,116票選舉戈連任。在12日選舉副總書記投票中，戈親信華·伊華殊高(VLADIMIR IVASHKO)以3,109票對776票輕易擊退利加喬夫。新政治局人數由原來12名擴大到24人，其中包括15個加盟共和國黨首腦。雷日科夫、謝雅爾德納澤、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KRYUCHKOV)、亞佐夫(候補委員)全部退出政治局。除戈外，其餘23名政治局委員沒有一個同時兼任任何政府職位。13日中委會選舉中，利加喬夫竟然名落孫山。

其實，利的發言獲得很多掌聲，他的立場及看法反映很多代表的心聲。但如前指出，利既沒有經改班子，也沒有一套可供選擇的經改方案。這是他的致命弱點。既然他沒法取代戈爾巴喬夫，代表們就不願意讓他擔任第二把手，因為他們恐怕這會促成黨分裂。他最後竟連中委地位也不保，是這種矛盾情況的邏輯結局。

9月1日，葉利欽要求雷日科夫政府辭職，響起「倒閣風」第一炮。7日，波波夫提出同一要求。16日，波波夫把持下的莫斯科市議會舉行「倒閣」集會，參加人數三萬。(註20) 19日，俄羅斯國會決議要求雷日科夫政府辭職(較早前，國會於11日已經通過沙塔林方案)。(註21)

11月7日國慶活動中，激進反對派繼五·一後再一次與政府打對台，進行反十月革命、反列寧、反「社會主義」活動。

14日，戈最高軍事顧問施·阿赫羅梅耶夫元帥(SERGEI AKHROMEEV)表示不能排除有需要時運用軍隊維持國家完整的可能性。同日，戈委任保守分子烈·克拉夫珍科高(LEONID KRAVCHENKO)掌管國家電視及電台。(註22) 17日，人大中的強硬派集團「聯盟」(SOYUZ)領導人域·艾思尼斯(VICTOR ALKSNIS)中校提出警告，假使12月人大四次會議召開時國家混亂情況還沒有改善，他將會要求罷免戈爾巴喬夫。27日，亞佐夫在電視宣佈，他已發出命令，對任何攻擊軍事人員或設施的人，格殺

勿論。28日，戈呼籲人民維護國家完整。29日，雷日科夫在訪問一個兵工廠時說：“我聽到要求產軍綜合體解散的聲音。我絕對反對這樣做。一日我在位我就不會容許這種情況出現。”

12月1日，“聯盟”要求內政部長巴卡京(現已由以前的保守傾向改而成為自由派)辭職。2日，戈罷免巴卡京，委任強硬分子普戈(前拉脫維亞黨魁兼拉脫維亞克格勃主席)代替。阿富汗戰爭英雄兼著名強硬分子波·基羅莫夫上校(BORIS GROMOV)出任副內政部長。同日，戈發出總統命令，把所有容許逃避兵役的共和國法例廢除。11日，克留奇科夫發表電視講話，表示國家受到“由外國道義上和政治上加以支持的極端激進組織”所威脅。

17日，人大四次會議召開。20日，謝雅爾德納澤抨擊獨裁傾向冒升，以辭職表示抗議。25日，會議進行期間，雷日科夫心臟病突發。會議經過兩輪投票選出保守分子亞納耶夫為副總統。1月中旬，戈爾巴喬夫委任財長兼保守分子帕夫洛夫接替雷日科夫出任總理。財長一職由奧爾洛夫接替。

1991年1月7日，傘兵部隊開入立陶宛首府維爾紐斯，對付逃避兵役。翌日，部隊佔據包括出版大樓在內的多座政府建築物。11日，部隊武力佔領立陶宛國防議會大樓。13日凌晨，衛戍部隊出動坦克攻入電視大樓。衝突中，14人死亡。(註23)電視大樓一直被佔據到八·一九政變失敗後為止。

根據普戈解釋，事件緣於立陶宛共產黨成立“救國委員會”；委員會前往電視大樓要求終止反蘇宣傳，遇到襲擊，於是向衛戍部隊求援。部隊開赴現場時，分裂主義者佔據大樓，雙方混亂中發生衝突。(註24)

亞佐夫在國會就事件發言時，指責立陶宛政府為一個“資產階級專政”。(註25)

戈爾巴喬夫事後表示事前對事件毫不知情，但拒絕譴責部隊的做法。他在國會就事件發言時更顯露出十分強硬的態度。(註26)葉利欽呼籲俄羅斯裔士兵不要向市民開火(這相等於鼓

吹兵變），並說有鑒於這件事件，俄羅斯有需要成立獨立的軍隊。（註27）24日，俄羅斯國會否決對事件進行譴責，葉遭到一個不小的挫折。

蘇聯部隊亦一度佔據拉脫維亞首府里加(RIGA)一個警署。16日，一名市民在市郊一個軍營外被士兵開槍射殺。（註28）

自1989年夏天礦工工潮後，小規模罷工常有發生。1991年3月1日，烏克蘭頓巴斯煤礦工人進行廿四小時罷工。工潮迅速蔓延到西伯利亞的庫爾巴斯和哈薩克的卡拉干達(KARAGANDA)煤礦。礦工不滿政府1989年的承諾沒有兌現，要求加薪150%，更要求戈爾巴喬夫辭職。4月，政府提價，平均增幅六成。工潮擴散到其他行業。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MINSK)全市進行總罷工，工人提出同上要求。阿塞拜疆首府巴庫(BAKU)也受波及。

戈爾巴喬夫和帕夫洛夫親自接見工人代表，承諾加薪。但工人沒有響應戈、帕的復工呼籲。

三、四月的工潮使保守／強硬力量1990年11月以來的銳氣遭到一定挫折。葉利欽當然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同樣擔心工潮會失去控制——假使戈當時被迫下台，沒有一股力量（包括葉利欽在內）有能力控制局勢，工運大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葉因此願意協助戈解決工潮。經葉斡旋後，5月第二個星期，礦工同意復工，條件為戈把礦場轉交俄羅斯所有，准許礦場外匯留成85%。葉不愧有本領，既能解決工潮，又利用它向戈奪取經濟權力，一石二鳥。

工潮的結果是一個重要轉捩點。它促使戈爾巴喬夫接受權方向共和國轉移是一個無法逆轉的現實。

4月24日，中全會上，戈備受抨擊下要求辭去黨總書記職位，不獲接受。5月26日，民族主義者兼共產黨員加姆薩胡爾季亞當選格魯吉亞總統，成為蘇聯第一位民選總統。6月17日，葉利欽壓倒雷日科夫當選俄羅斯首任民選總統（雖然他領先雷很遠，但所得票數超過半數不多，絕不能像西方傳媒一樣形容他的勝利為“壓倒性”）。同日，「九加一」會議就新聯盟條

約達成基本諒解。

6月18日，帕夫洛夫要求國會授權政府實行法令統治，而無需首先得到總統同意，以貫徹“反危機”方案。（註29）顯然，這是一個向戈爾巴喬夫奪權的企圖。但帕的要求被國會否決。

（按：7月開始的政局發展留待《八·一九政變》一章論述。）

蘇聯各政治流派的階級屬性

綜合以上幾章的分析，別於波蘭和匈牙利，蘇聯沒有筆者稱之為新興幹部階級的形成、興起；民營企業家階級力量亦微不足道。1990年以前，蘇聯外部收支平衡十分健康。這與匈牙利和波蘭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蘇聯經濟於八十年代中葉無疑受到龐大壓力，但這種壓力是有關如何扭轉頹勢，以確保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能夠維持下去，與匈牙利和波蘭陷於全面破產的絕境不能同日而言。就階級屬性而言，跟匈牙利和波蘭改革派不同，戈爾巴喬夫一夥與下述的基里辛、謝爾別斯基他們一樣，都屬於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代表；所不同者在於他們明白改革是這個階級的唯一出路。他們實行“開放”、“重整”和新東歐政策便是為了改善蘇聯經濟，藉以鞏固這個階級的統治基礎。戈爾巴喬夫最後被迫放棄一黨專政，是新東歐政策因應東歐1989年末的劇變而產生出來的邏輯發展（見第廿二章），與波共和匈共放棄一黨專政的原因、背景不能相提並論。

戈爾巴喬夫上台時，他、利加喬夫、雷日科夫、亞科夫列夫等人均屬於溫和改革派。他們大部份都是安德羅波夫一手扶植的接班人。契爾連科在位時的過渡期間，戈一干人等與以莫斯科黨魁基里辛和烏克蘭領導人謝爾別斯基（SCHERBITSKY）為首的保守派展開接班爭奪戰。利加喬夫充當戈的打手，透過《消息報》揭基里辛瘡疤，嚴重削弱基的實力基礎。契爾連科謝世，戈趁著謝爾別斯基正在訪美，馬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戈以退為進邀請基里辛主持契的喪禮（傳統上，喪禮主持者便是接班人）。孤軍作戰的基不敢接受。終於，在葛羅米柯擁護下，戈順利登上總書記寶座。（註1）

戈上台後，利加喬夫成為第二把手，主管意識形勢。如前所述，“開放”政策於切爾諾貝爾事件後發展一往無前，利表

示反對，成為第一個與戈分手的前度盟友，兼為新一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在戈與利關於“開放”政策的鬥爭中，雷日科夫置身於度外。有關經改，戈與雷一直站在同一陣線，直到1990年9月11日戈公開表示支持“沙塔林方案”為止。但戈給予激進改革方案的支持是不徹底的。他始終希望能夠在現時相對上來說屬於保守改革派(有別於保守派)的雷日科夫和激進改革派兩者之間，找一個平衡點。雷日科夫拒絕與沙塔林方案進行妥協，戈便找阿甘別吉揚提交折衷方案。帕夫洛夫要求給予政府緊急權力以貫徹“反危機”方案，又猛烈抨擊“大交易”方案之同時，戈權宜地把兩個方案併湊一起，提交7月中旬在倫敦召開的「G七加一」會議(西方七個發達工業國家高峰會加戈爾巴喬夫)。

雖則如此，戈從頭到尾基本上都以他開始時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為依歸。這是為什麼他頂住1990年秋、冬的「倒閣風」的巨大壓力，拒絕撤換雷日科夫。這也是為什麼他沒有跟波共和匈共改革派一樣，自動放棄「社會主義」。如前所述，1991年7月4日，戈才首次表示「社會主義」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下一章指出，他7月26日才正式否定計劃經濟。他在八·一九政變流產後剛一返回莫斯科第一次發表講話時，便重申他對「社會主義」和改革共產黨的信念。只有在他認識到流產政變已把蘇共判了死刑後，為突破被迫靠邊站的困局，他才終於宣佈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

雷日科夫堅持經改要循序漸進，因為這切合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利益。皆因戈爾巴喬夫政策上的失當，蘇聯經濟1990年陷於水深火熱中，蘇聯淪為西方集團的附庸成為定局。這情況下，把改革速度減慢，盡量為聯盟政府保留對國營企業的控制權，有利於上述階級在不能避免的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保留它的利益，把這些利益轉化到一種能夠在新的經濟體制中與管治權脫離的形態。需要爭取這個空間的不限於傳統官僚資本階級。激進改革對部份國營企業非常不利。例如，把價格完全放

開對細小的加盟共和國的企業打擊很大。這些企業的幹部，聯同傳統官僚資本階級，構成保守改革派的社會基礎。

雷日科夫在任時，帕夫洛夫為財政部長。基本上，帕的階級屬性與雷相同。但別於雷，帕出任總理後，與保守派的關係十分密切。

保守派以聯盟政府的內政部、克格勃和國防部為大本營，社會基礎為產軍綜合體(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利加喬夫僅屬於它意識形態上的代表人物。保守派與激進改革派和溫和改革派(戈等)形成對立是順理成章的。但由於甚至保守改革派也以裁減軍備和削減國防、國家安全開支為經改的代價之一，保守派與保守改革派兩者之間亦有一定矛盾。

本來，保守改革派與溫和改革派兩者的利益最為接近。但1990年末至1991年初，經濟混亂愈演愈烈。這促成了保守改革派和保守派互相靠近。這個趨向在雷日科夫因心臟病發下台前已經開始。如前所述，1990年11月29日，雷表示反對解散產軍綜合體。帕夫洛夫上台後，因應客觀形勢的繼續惡化，以上趨向的發展步子愈發加大。

1990年冬，聯盟瓦解的危機加劇，保守派變得強硬起來，戈爾巴喬夫被迫向它作出多番讓步。1991年春以後，保守派的銳氣因三、四月工潮稍為收斂，戈爾巴喬夫重新向激進改革派傾斜，致力於與加盟共和國達成新聯盟條約協議。5月，為解決工潮，戈同意把西伯利亞煤礦場移交俄羅斯名下。6月17日，「九加一」會議達成基本諒解。這些發展再進一步把保守改革派推向保守派。6月18日，帕夫洛夫便要求國會賦予政府緊急權力，以貫徹“反危機”方案，企圖向戈爾巴喬夫奪權。這期間，帕夫洛夫、普戈、克留奇科夫、亞佐夫等紛紛異口同聲抨擊“大交易”方案向西方搖尾乞憐。

眾所週知，激進改革派以俄羅斯為大本營。我們在第廿二章分析，他們擁護激進改革是出於維護俄羅斯一己利益（“沙塔林五百日方案”把國家財產轉給共和國最為露骨不過）。正

如蘇聯希望擺脫東歐的負累一樣，俄羅斯不願意繼續給其他加盟共和國津貼。

本來，蘇聯經改仍未起步，國營企業幹部沒有形成一個新興幹部階級。但1990年起，社會出現極端混亂，國家陷於四分五裂，中央政府大權旁落，促使企業也向中央主管部門奪權。自然，企業的奪權行動得到加盟共和國政府撐腰。《經濟學人》最近在一篇關於烏克蘭的報導中提供了以下資料：

“很多企業主管在國會投票贊成經濟主權。他們要求〔加盟共和國政府〕對執行把企業控制從莫斯科轉移到基輔的共和國法例提供幫助。”（註2）

上文分析，部份企業支持盡量維持故有的計劃模式。但對於經營條件較好的企業（它們絕大部份集中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共和國），向中央奪權顯然對它們有利。這些企業的幹部構成激進改革派的主要社會基礎。舉一個例，出於上文已論及的原因，西伯利亞的煤礦幹部是葉利欽的堅強後盾。

由於經濟全面崩潰，不論保守改革派，溫和改革派或激進改革派都接受私有化的必要性，作為尋求西方經援的交換條件。（註3）保守改革派希望把過程拖慢的階級因素上文已有所論述。激進改革派希望採納波蘭模式，因為它明白到否則便無法吸引西方資金和經援（美國的態度具代表性），而最為重要的是，它沒有保守改革派的特殊階級顧慮。況且，它所代表的企業幹部在私有化和外資侵入的衝擊下，有一定應變能力。事實上，生產“硬貨品”的工礦企業絕對無懼於進軍世界市場。當然，私有化無可避免會淹沒上述幹部其中一部份。但這點不影響我們對激進改革派的階級屬性的分析。我們在有關匈牙利變局的分析中曾指出，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有時有需要犧牲該階級其中個別集團的利益，以便能夠更有效地維護該階級的整體利益。

第廿五章提及，被視為保守的“俄羅斯共產黨人”派系在俄羅斯共產黨和俄羅斯國會有雄厚實力。它多位代表在俄共成立大會猛烈抨擊戈爾巴喬夫。波洛茲科夫順利當選第一書記。

1990年5月，俄羅斯國會選舉總統，經三輪投票後，葉利欽才險勝波洛茲科夫。按理，“俄羅斯共產黨人”應該屬於雷日科夫的支持者。但出乎意料，1990年9月，俄羅斯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沙塔林方案”。（註4）9月19日，又以154對4票通過決議，要求雷日科夫政府總辭。（註5）如前所述，直到1991年中，“俄羅斯共產黨人”仍佔俄羅斯國會四分之一議席。換句話，他們當中絕大部份，甚至全部都支持了沙塔林方案和參加了「倒閣」運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怪」現象？

其實，以上一點也不足為奇。激進經濟改革方案是維護俄羅斯一己利益的體現。1990年下半年，經濟滑坡加劇，國家分裂加速，俄羅斯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出現利益分化，促使“俄羅斯共產黨人”與聯盟政府疏離，是符合邏輯的發展。上述共和國企業幹部向中央奪權便是這個發展的一個主要方面。換句話，雖然蘇聯沒有經過徹底的經改的洗禮，舊制度下的統治階級同樣出現了勢成水火的利益分化。不過，跟波蘭和匈牙利有別，這種分化表現為聯盟政府和俄羅斯（主要）、烏克蘭（次要）的對抗。葉利欽一夥於1990年7月黨廿七大上退出象徵聯盟利益的聯盟共產黨，是這種分化的形像化表現。

以上分化不僅觸及企業和共產黨內部，它滲透整個統治集團的每一個組成部份。從克格勃、軍隊、內政部……到大眾傳媒，都出現俄羅斯集團與聯盟集團的抗衡。

綜合上述，激進改革派具有明確的階級屬性。表面上，葉利欽是一個俄羅斯民粹主義的煽動家。（註6）實際上，激進改革派骨子裡不外是從舊有統治階級中分裂出來的俄羅斯集團的政治代表。

八·一九政變

政變前夕的政局

上文分析，1990年底，戈爾巴喬夫節節向保守力量（包括保守派及保守改革派）作出讓步。從該年11月7日克拉夫珍科高出掌國家電視台開始，多名保守分子陸續上台，計有，普戈、基羅莫夫、亞納耶夫、帕夫洛夫和奧爾洛夫。1991年1月，在戈同意或默許下，武裝部隊在三個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展開行動。

1991年3、4月的工潮令保守勢力稍為收斂。工潮亦促使戈重新向激進派和加盟共和國分裂力量傾斜。這個發展令保守勢力再次蠢蠢欲動。6月18日，帕夫洛夫企圖向戈爾巴喬夫奪權，但無功而退。

7月19日，葉利欽宣佈俄羅斯將於29日與立陶宛簽署協約，保障雙方公民在對方境內的權利。（註1）20日，葉利欽以俄羅斯總統身份發出指令，禁止共產黨在俄羅斯轄下的企業、政府機關及其他行政單位內進行活動，14日內生效。（註2）22日，俄羅斯共產黨發言人稱葉的法令因違反《憲法》而無效。（註3）

2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在頭版刊載一篇題為《向人民進一言》（“A WORD TO THE PEOPLE”）的聲明。聲明說：

“我們深信陸軍和海軍……將能避免自相殘殺的戰爭和祖國的分裂，並將是安全的保證，以及社會上健康力量的基礎。”（註4）

聲明提到：

“我們偌大的祖國通過歷史落到我們手上，現在正在走向滅亡、一直往漆黑和虛無下沉。讓我們成立一個全民的愛國運動，讓每人都以他的意思和影響力拯救國家。”

（註5）

聲明又問道：

“我們怎會讓那些不愛這個國家的人統治我們？他們只會乞憐於域外的人。”（註6）

顯而易見，聲明所針對的不僅是葉利欽一派，戈爾巴喬夫也被包括在內（按：戈於7月中旬前赴倫敦向七國高峰會乞憐，卻幾乎空手而回；再者，「九加一」協議實際上是讓中央集權的舊蘇聯解體）。

聲明聯署人一共十二個，包括蘇聯地面部隊總司令兼副國防部長華·華爾蘭力科夫將軍（VALENTIN VARENNIKOV）、基羅莫夫、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蘇共掌管產軍綜合體的最高負責人（註7）奧·巴克拉諾夫（OLEG BAKLANOV）、蘇聯農會主席斯塔羅杜布和夫（V.STARODUBTSEV）、蘇聯國營工商業、建築業、運輸業及通訊業協會會長季茲亞科夫（A.TIZYAKOV）等。（註8）

上述最後三人均為政變緊急委員會成員；華爾蘭力科夫亦有參與策劃政變——8月18日前往克里米亞向戈爾巴喬夫「攤牌」的一千人等中包括他在內。至於副內政部長基羅莫夫，政變前，大部份西方分析家都認為他是最有能力發動政變的人物。他在政變的角色有待日後查証。（註9）

24日，蘇共政治局發表聲明，批評葉20日的法令違反《憲法》，要求政府把它推翻。該日，亞美尼亞宣佈加入「九加一」談判，一改之前決意鬧獨立的態度。（註10）

25日，蘇共召開中全會，戈向會議提交一份新黨綱草案，要求11月至12月召開黨代表大會進行表決。戈向會議指出，過去兩年來，共有420萬人退黨（約佔黨員人數五分之一），不修訂黨綱，便很難挽回這個趨勢。（註11）

草案宣佈放棄已經“過時”的階級鬥爭論；放棄「社會主義」最終會戰勝資本主義的信念。認為現代「社會主義」理論的來源，除「馬克思主義」外，還包括如人道主義的其他觀念。指出極權制度扭曲了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的努力；國家對產業的壟斷、官僚化的政權、「馬克思主義」唯我獨專、政府不

容忍民主改革，遏制了人民的創造力。草案主張經濟自由；支持國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併存的混合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與國家管理分開”（即放棄計劃經濟）。共產黨需要為它的政策在國會進行鬥爭（即放棄一黨專政）。信仰自由應該獲得尊重。（註12）一句話，草案實際上建議黨奉行社會民主路線。

會議前，一般預料會有激烈辯論。但出乎意料，保守勢力三緘其口，態度溫和。一般估計，它們留待代表大會才與戈派一決雌雄。

對於葉利欽20日的法令，與會代表則群起而攻之。26日，戈向會議表示會運用總統行政命令把該法令取消。會議成立專責委員會草擬決議案譴責法令。（註13）

26日，總統顧問亞科夫列夫向戈請辭。亞較早之前於6月聯同謝雅爾德納澤、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伊(RUTSKOI)、波波夫、索布恰克、沙塔林、戈爾巴喬夫顧問尼·彼得科夫(NIKOLAI PETRAKOV)、曾為安德羅波夫助手的戈爾巴喬夫顧問亞·戈爾斯基(ARKADY VOLSKY)、西拉耶夫等人，成立“民主改革運動”，打算建立一個新政黨。（註14）

27日，憲法審查委員會主席呼籲葉利欽自行把20日的法令廢除，否則委員會便要就法令進行審查；表示他個人認為法令違反《憲法》。（註15）

28日，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及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會談七小時，終於就聯盟政府稅收問題達成協議。根據該協議，聯盟政府沒有獨立徵稅權，財政收入依靠加盟共和國上繳本地稅收其中一部份，比率經協商決定。（註16）

30日，俄羅斯與立陶宛簽署條約，承認立為獨立國家。（註17）同日，美蘇高峰會在莫斯科召開，布什宣佈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註18）（按：其實，美蘇貿易額很低，現每年約為11億美元，最惠國待遇對蘇裨益不大。）

31日凌晨，立陶宛與白俄羅斯邊界關卡發生衝突，七名立

陶宛守衛死亡，一人重傷。一般認為，事件是武裝部隊強硬派的一個舉動，為使該日簽署的美蘇裁減戰略武器條約蒙上陰影。

8月2日至3日，俄羅斯人大中的“共產黨人民民主派”成立“俄羅斯共產黨人民民主黨”。（註19）

5日，葉利欽新聞秘書宣佈禁制共產黨在企業、機關進行活動的法今年底才執行。（註20）

6日，俄羅斯共產黨第一書記波洛茲科夫辭職。（註21）（按：筆者從手頭上掌握到的資料無法確定這名強硬分子辭職的因由。）

8日，《真理報》刊載一份黨綱草案，內容比戈爾巴喬夫7月提交中全會的草案遠較「保守」。戈草案所廢除了的字眼如“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全部重新出現。《真理報》對為什麼作出修改、修改經由誰人批准沒有作出任何解釋或說明。（註22）

13日，帕夫洛夫在新聞發佈會表示，除非在新聯盟條約底下，中央對經濟維持控制能力，否則國家將出現權力真空狀態。（註23）（按：俄羅斯、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將於8月20日率先簽署條約。）

15日，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把政治局委員亞科夫列夫開除出黨。兩星期前，亞公開表示蘇聯面臨的危機顯示「社會主義」已經失敗。（註24）

16日，軍方《紅星報》發表文章，呼籲共產黨黨員緊密團結，捍衛「社會主義」和國家完整。文章說：

“作為蘇聯公民及共產黨員的責任是……責無旁貸地確認列寧思想，捍衛社會主義祖國。武裝部隊始終是我們獨立權力的捍衛者……許多事情需要依賴軍中的共產黨，那包括國家及軍隊的尊嚴，以及維繫一支「獨立和團結」的武裝部隊，讓戈爾巴喬夫和最高蘇維埃有所憑藉，維護國防。”（註25）

文章又針對葉利欽限制共黨活動的法令說：

“反共勢力公開攻擊蘇聯共產黨……共產黨員的責任是維護及鞏固共黨組織在軍隊及合作社的領導角色……。”

(註26)

※

※

※

第廿六章分析，戈爾巴喬夫1991年春之後重新向俄羅斯集團傾斜，促使保守改革派和保守派更進一步團結起來。帕夫洛夫6月18日的奪權企圖失敗，沒有令保守勢力氣餒。《向人民進一言》的“我們怎會讓那些不愛這個國家的人統治我們？”這句說話，顯示奪取政權仍然在保守勢力的議事日程上。

戈7月26日向中全會提交的新黨綱草案宣佈要放棄計劃經濟，直指保守改革派所代表的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要害。7月28日，戈繼同意把國家財產轉給共和國後，又把中央財政的稅收權力徹底下放給加盟共和國，直接危害上述階級和產軍綜合體的利益。葉利欽7月20日甚囂塵上的、咄咄進迫的法令更加火上加油。這些發展把保守勢力逼向死角。《真理報》8月8日刊載新黨綱草案修訂稿；帕夫洛夫13日表示有需要保留聯盟政府的經濟控制權；《紅星報》16日發出呼籲，這一連串舉動顯示保守勢力沒有預備坐以待斃。劍拔弩張的形勢一觸即發。

8月4日，戈爾巴喬夫往克里米亞渡假，打算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與俄羅斯、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簽署新聯盟條約。保守勢力上述8日至16日的動作有否令他警惕呢？事後看來，保守勢力決定在19日戈返回莫斯科簽署新聯盟條約前夕策動政變，時間的選擇極為合理。

8月18至19日

8月18日16時50分(註27)，總統衛士長向戈爾巴喬夫報告，由克格勃行政主管尤·狄漢諾夫(YURI TIKHANOV)、華爾蘭

力科夫、巴克拉諾夫和戈爾巴喬夫幕僚長尤·波爾丁(YURI BOLDIN)率領的一千人等要求與戈見面。(註28)戈未及回應前，來人已擅自闖進。他們向戈表明來意，要求戈簽署總統行政命令，把權力轉交副總統亞納耶夫，但被戈拒絕。戈於是被軟禁在克里米亞，直到政變流產為止。

19日清晨6時18分，塔斯社公報戈爾巴喬夫因患病經已辭職，由亞納耶夫執行總統職務。(註29)7時15分，塔斯社宣佈根據蘇聯《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代總統亞納耶夫發出命令，在一些地區實行緊急狀態六個月。這六個月期間，一個八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註30)該八人為：亞納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諾夫、亞佐夫、普戈、克留奇科夫、斯塔羅杜布和夫和季茲亞科夫。值得留意，八人均為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和產軍綜合體的利益代表。

八人委員會發表《告蘇聯人民書》，聲稱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經“走入死胡同”；指出“蘇聯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處於極其危險的嚴重時刻”，“面臨著致命的危險”，國內“出現了以毀滅蘇聯、瓦解國家和不惜任何代價奪取政權為方針的極端主義者勢力”。“蘇聯日益加深的政治和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已破壞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註31)

《告人民書》表示八人委員會“擁護真正的民主進程，擁護徹底的、使我們祖國走向革新、使祖國經濟和社會繁榮的改革政策，只有這種繁榮才能使祖國在國際社會中佔據應有的地位。”(註32)

對於西方國家給予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運動不同程度的支持，《告人民書》表示不能接受：國際上，有人“提出要改變我們的邊界，甚至肢解蘇聯，對蘇聯某些設施和地區實行國際庇護……永遠不容許任何人侵犯我們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註33)

亞納耶夫再以代總統身份發表聲明，解釋實行緊急狀態是為了給改革創造條件：

“這些措施並不表示放棄……改革路線。這些措施迫不得已，是為了生死攸關的需要，以挽救陷於崩潰的經濟，挽救國家於飢餓之中，阻止大規模的國內衝突升級的威脅……它是為肅清違反憲法、難以管治，和在蘇聯某些地區本質質是犯罪的兵團，散播精神和物質的恐懼以催化分裂的進進程。全部一系列措施旨在……使社會經濟生活正常……〔為〕改革創造條件。”（註34）

亞納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諾夫三人又聯署另一份聲明，強調實行緊急狀態完全符合《憲法》的規定。（註35）

上午10時，裝甲運兵車開入莫斯科市中心，駛往俄羅斯議會大樓。（註36）11時41分（註37），八人委員會發出第一號命令，十六點內容包括：各級政權和管理機關必須無條件實施緊急狀態，否則由八人委員會的全權代表接管；違反憲法規定的政權組織、管理機關、軍事組織必須立刻改組，它們所發出的法令、命令一律無效；馬上終止阻礙局勢正常化的政黨、社團活動，立刻交出所有非法武器；禁止集會、遊行，必要時實施宵禁；對新聞實行監督，只容許《真理報》、《消息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紅星報》、《勞動報》、《工人論壇報》、《農村生活報》、《莫斯科真理報》、《列寧旗幟報》九份報章繼續出版。莫斯科電台（RADIO MOSCOW）、俄羅斯電視台和莫斯科「回聲」電台（MOSCOW ECHO RADIO）全部關閉。（註38）

較早之前，葉利欽抵達俄羅斯議會大樓，會見西方記者和一些外國使節。（註39）葉的盟友、智囊、助手亦先後抵達。11時46分，葉在數名助手陪同下，步出議會大樓，走近一輛裝甲運兵車（一些報導說是坦克），與運兵車指揮握手（士兵顯然沒有接到任何對付葉的命令），跟著踏上運兵車，宣讀一份由他、西拉耶夫等人聯署的聲明。聲明指出葉利欽曾於16日與戈爾巴喬夫通電話，當時戈的健康情況良好；譴責八人委員會的成立屬於一場非法的政變；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及呼籲工人進行無限期罷工。（註40）葉利欽宣讀聲明時，聚集在議會大樓前的群

眾不足二百人；西方記者進行採訪完全沒有遭遇任何阻撓。

中午時份，坦克開抵議會大樓前。14時，坦克在《消息報》、《莫斯科新聞報》(MOSCOW NEWS, 持激進改革派立場)和塔斯社外駐守。(註41) 由於《消息報》編輯拒絕刊載葉利欽等人的聲明，報社印刷工人實行罷印，令報章當日下午脫版。(註42)

17時11分，葉利欽宣佈：21日星期三召開俄羅斯人大會議；他已接管俄羅斯境內“所有蘇聯行政機關”，包括克格勃、內政部在內。並下令所有參加政變的軍隊及克格勃單位馬上撤回營地。(註43)

17時26分，亞納耶夫下令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實施緊急狀態。(註44) 八人委員會中六人(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除外)召開新聞發佈會。(註45) 會上，亞納耶夫表示：八人委員會將繼續推行民主及市場化改革；委員會已和九個加盟共和國取得聯絡，得到它們壓倒性擁護；戈爾巴喬夫停職完全符合蘇聯《憲法》規定，國會將於27日召開加以追認；不會放棄制訂新聯盟條約，但人民應該有更充足的時間進行討論。普戈強調打擊罪行的急切性。季茲亞科夫表示：“我們自然不會放棄邁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但指出改革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實行時，必須要有條理。(註46)

該日，八人委員會發表盧基揚諾夫一份文件，文件表示原定20日簽署的新聯盟條約不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意願，需要進一步加以討論。(註47) 據盧後來向國會解釋，該份文件簽署日期為8月16日，所反映的是國會本身的意見，與政變完全無關。(註48)

傍晚時分，聚集在俄羅斯議會大樓外的群眾增加到約5,000人。一些人在通往大樓的馬路上築起路障，軍隊沒有加以阻止。(註49)

較早之前，列寧格勒軍區司令域·薩姆索諾夫中將(VIKTOR (一說ALEXANDER) SAMSONOV)在列寧格勒電視台宣佈，八人委員會授權他接管列寧格勒，所有罷工一律禁止。(註50)

晚上，塔斯社和電視晚間新聞節目VREMYA 就葉利欽的抗爭、罷工號召加以如實報導。(註51)

根據事後報導，部長會議於19日召開秘密會議，其中化學工業部部長、民航部部長等人表示擁護八人委員會。(註52)

波羅的海軍區司令庫茲明(KUZMIN)通知波羅的海三國，八人委員會授權他接管三國。傘兵部隊登陸愛沙尼亞，軍艦把愛首府塔林港口封鎖。在維爾紐斯，四輛裝甲運兵車於下午12時50分佔據通訊部。內政部特種部隊佔據電話機樓，但沒有切斷連接莫斯科的電話線路。蘭斯布爾吉斯透過未被佔據的電台呼籲市民進行和平的不合作抗爭。傘兵部隊在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納斯佔據電視台及電台，停止電台廣播。(註53)

烏克蘭議會主席／總統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呼籲人民保持安定，敦促工人不要進行罷工。(註54) 據報導，葉利欽曾要求克譴責八人委員會， 但被拒絕。(註55) 據事後報導，克與八人委員會取得妥協，以不作出譴責作為委員會不在烏克蘭實施緊急狀態的交換條件。(註56)

格魯吉亞總統加姆薩胡爾季亞呼籲人民保持安定。(註57)

亞納耶夫發表《致各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聯合國秘書長》公開函件，表示希望他們對蘇聯所採取的臨時性緊急措施給予“應有的理解”；這些措施“絕不涉及蘇聯按照現行條約和協定承擔的國際義務”；蘇聯今後“仍準備在睦鄰、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公認 原則基礎上發展與各國關係 ”。(註58)

亞納耶夫又特別致函德國總理科爾，指戈爾巴喬夫正在克里米亞康服，表示希望他能早日恢復職務。(註59)

蘇聯軍方發言人表示，蘇聯將按照原定安排撤走駐守前東德的駐軍。(註60)

西方國家對政變的反應大致分為兩大類。美、英等採取對抗性的立場。布什最初只宣佈凍結經濟援助和表示美蘇關係可能因此而受到影響。但稍後表示不承認政變，要求恢復戈爾巴

喬夫職務。英相梅杰(香港譯作馬卓安)譴責政變違反蘇聯《憲法》，宣佈凍結五仟萬英鎊的技術援助。加拿大跟隨英、美宣佈凍結經援。戴卓爾呼籲蘇聯人上街反抗；在戈爾巴喬夫復職前，西方國家應馬上凍結削減國防開支。以援助蘇聯最多的德國為首的歐洲大陸的反應比較謹慎。德國總理科爾表示關注戈爾巴喬夫的安危。密特朗要求八人委員會保證戈、葉的人身安全及自由。法國外交部表示倘若戈爾巴喬夫不能復職，那將是“一件大事”。比利時外長表示“焦慮”。意大利表示“關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表示事件“令人感到非常憂慮”。北約宣佈21日召開緊急外長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表示“感到非常吃驚”。日本“希望蘇聯改革不會受影響”。(註61)

8月20日

凌晨，19日被派遣進入莫斯科的KANTEMIROVSKAYA裝甲師中十輛坦克宣佈支持葉利欽。(註62) 據葉利欽事後宣稱，另一支TAMANSKAYA裝甲師的部兵團亦變節而改投他的陣營。(註63) 據另一項報導，變節的還包括19日被派往莫斯科的TULSKAYA傘兵師。(註64) 事後披露，國防部傘兵部隊司令柏·格拉喬夫(PAVEL GRACHEV)少將拒絕接受八人委員會進攻議會大樓的命令。(註65)

早上，聚集在俄羅斯議會大樓前的群眾約五萬人。(註66) 外長別斯梅特內赫到外交部上班，聲稱患病，請假兩天。(註67) 市民到國營商品購物時發覺長時間以來短缺的商品突然再度出現。(註68) 顯然，八人委員會下令把存貨發售，以換取市民支持。

西伯利亞全國最大煤礦區庫爾巴斯約半數煤礦(26個)進行罷工，抗議政變。澳爾庫塔市(VORKUTA)13個礦場中5個加入罷工行列。遠東區庫茲涅茨克盆地101個礦場中20個停工。但舉

足輕重的西伯利亞秋明油田(TYUMEN)沒有參加罷工。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均沒有發生罷工。(註69)

正午時份，葉利欽一千人等在俄羅斯議會大樓露台向聚集在大樓前面的150,000群眾(一說100,000)發表講話。(註70)葉要求三天之內由外國醫生為戈爾巴喬夫檢查身體。(註71)謝雅爾德納澤表示倘使政變成功，“這是內戰的開始。這是和平共存的終結和新一輪軍備競賽及冷戰的開始”。(註72)列寧格勒約100,000人在皇宮廣場舉行集會。(註73)

下午，葉利欽在議會大樓內與英相梅杰及戴卓爾通電話。戴接納葉的邀請，盡快成立一個由醫生及諾貝爾獎得主組成的代表團，由她率領前往克里米亞替戈爾巴喬夫檢查健康。(註74)俄羅斯東正教主教阿納塞(ALEXEI)宣佈支持葉利欽，要求八人委員會容許戈爾巴喬夫向人民發表講話。(註75)

日落時份，約20,000人留守俄羅斯議會大樓外。(註76)晚上，在議會大樓一英里範圍內包圍大樓的坦克為數約100架。「回聲」電台報導，軍方已發出通知，要求馬上把路障拆除，否則便展開進攻。(註77)布什與葉利欽通電話，重申美國要求戈爾巴喬夫復職和給予他支持。(註78)

20時51分，「回聲」電台轉播葉利欽尋求人民支持的呼籲。(註79) 21時32分，莫斯科軍區司令加里寧(KALININ)在電視台宣佈莫斯科由23時到21日凌晨5時實施宵禁。(註80) 36分，國家電視台宣佈帕夫洛夫19日早上因高血壓患病，在醫院留醫。大約於同一時間，有消息說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已辭去八人委員會職位。(註81) 22時54分，政治局委員米·梳爾科夫(MIKHAIL SURKOV)否認亞佐夫已辭職。(註82)

20日晚顯然是一個關鍵時刻。俄羅斯人大將於21日舉行特別緊急會議。八人委員會在政變公佈前沒有逮捕葉利欽等人已經是一大失著。雖則如此，他們現在仍有機會先發制人趕及在星期三清晨前向俄羅斯議會大樓發動攻擊。一般估計，最有效的進攻辦法是空降精銳部隊到大樓天台。

葉利欽一千人等當然明白上述危險的存在。20日深夜，葉得力助手干·波爾貝里斯(GENNADI BURBULIS)致電克留奇科夫，詢問克是否打算進攻大樓。(註83)

20早上，蘇聯部隊佔據里加(RIGA)電台及中央電話機樓。(註84)拉脫維亞國會宣佈將於21日正式脫離蘇聯獨立。(註85)坦克集結在愛沙尼亞首府塔林市郊。(註86)市民在電台及電視台外築起路障。(註87)在維爾紐斯，包圍國會大樓的80輛坦克和裝甲運兵車撤退到市北郊區。(註88)

摩爾達維亞400,000人在首府基辛尼爾夫(KISHINIEV)示威。(註89)總統梅·史尼戈爾(MIRCEA SNEGUR)拒絕承認八人委員會。(註90)總理華·梅納夫斯基(VALERIU MURAVSKI)宣佈八人委員會批准繼續出版的九份報章一律禁止出版。(註91)

18時24分，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表示八人委員會不合法，委員會的成立踐踏加盟共和國的權利。(註92)但納呼籲人民不要罷工。(註93)

20時51分，烏克蘭議會主席／總統克拉夫丘克改變早一日的立場，宣佈不接受八人委員會的命令。(註94)

西方國家經過一日磋商後，立場趨向於統一。歐洲議會外長會議發表聲明，指政變“違反(蘇聯)憲法”、違反赫爾辛基條約(HELSINKI FINAL ACT)和違反巴黎憲章；要求恢復戈爾巴喬夫職務。會議還決定星期五派遣高層代表團就戈的健康狀況進行調查，中斷給予蘇聯的85.4億美元援助。(註95)日本首相海部俊樹表示考慮跟隨西方國家終止對蘇聯的援助。(註96)布什宣佈剛一履新的新任美國駐蘇大使羅·史特勞斯(ROBERT STRAUSS)將照原定安排前赴莫斯科，但其任務是就局勢進行觀察；史不會向八人委員會遞交委任證明文件。(註97)晚上，密特朗在電視發表講話，依然維持較謹慎的態度，指“現在就蘇聯前景作出預測為時過早”。記者追問下，他才表示當然對“政變”加以“譴責”。(註98)德國亦改變早一日的立場，要求

戈爾巴喬夫復職。(註99) 梅杰、戴卓爾、布什繼續與葉利欽保持聯絡。

8月21日

20日子夜時份，駐守俄羅斯議會大樓外圍其中部份坦克和裝甲運兵車開始有所行動，試圖越過路障。

21日零時32分，一名市民被一輛裝甲運兵車輾過，當場斃命。1時正，一隊裝甲車隊被困在一條隧道之內。1時30分，KANTEMIROVSKAYA及TAMANSKAYA兩個裝甲師撤離市中心，只餘下SPETSNAZ師和克格勃部隊。42分，一輛裝甲運兵車著火焚燒。2時正，兩輛裝甲運兵車發生爆炸，一名市民被擊斃，另一名被運兵車壓死。5時正，經30名俄羅斯人大代表斡旋後，開往莫斯科增援的克格勃VITEBSK師同意不進城。據報導，其中9輛裝甲運兵車即時向代表們投降。(註100) BRYANSK、OREL及VLADIMIR軍校領導幹部決定支持葉利欽，立刻前往議會大樓參加防禦工作。(註101) 5時25分，波爾貝里斯再致電克留奇科夫。克向波表示不會進攻議會大樓，對波說“你們可以安心睡覺”。(註102) 8時，俄羅斯議會國防委員會宣佈危險已過。(註103)

根據葉利欽事後透露，克格勃反恐怖主義精銳部隊ALPHA GROUP(曾參加1991年1月13日佔據維爾紐斯電視大樓行動)接到進攻俄羅斯議會大樓的命令。但部隊20名指揮官拒絕執行命令。行動因此而數度延遲，先由20日18時推遲至20時，復至22時、21日1時及3時。(註104)

據ALPHA GROUP兩名副司令員米·戈羅維多夫(MIKHAIL GOLOVATOV)和施·干查洛夫(SERGEI GONCHAROV)說，接到命令後，司令召集全體隊員舉行會議，一致反對執行命令。戈、干表示，倘若部隊決定執行命令，它可於廿分鐘內完成任務。(註105)

5時40分，克格勃否認克留奇科夫經已正式辭職。(註106)早上，蘇共副總書記伊華殊高要求與戈爾巴喬夫見面。(註107)正午，遠東甘察卡(KAMCHATKA)核子潛艇司令費拉耶夫(FALEYEV)宣佈支持俄羅斯聯邦。(註108)

下午，俄羅斯人大特別緊急會議召開，出席人數不足法定的144人。(註109)葉利欽告訴代表克留奇科夫表示願意與葉一起帶同醫生前往克里米亞探望戈爾巴喬夫。會議決定接納提議，但成立特別小組代替葉利欽前往。(註110)14時15分，葉利欽再通告會議八人委員會成員正在莫斯科機場企圖逃走。(註111)15時，莫斯科解除宵禁。(註112)16時20分，國防部下令所有部隊馬上撤返營地。據後來報導，命令由戈爾巴喬夫從克里米亞發出。(註113)

16時59分，塔斯社報導八人委員會解散。(註114)17時24分，蘇聯國會國防委員會主席說八人委員會經已解散，其中兩人正在前赴克里米亞途中。(註115)事後報導，正確人數為四個，包括亞佐夫及克留奇科夫。(註116)18時54分，葉利欽宣佈他已接管蘇聯武裝部隊。(註117)19時14分，蘇聯國會主席團宣佈八人委員會把戈爾巴喬夫免職屬於非法；所有委員會的法令均屬無效；戈爾巴喬夫已恢復職務。(註118)塔斯社宣佈政變發起人將被檢控。蘇共政治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即將召開中全會；黨會繼續走改革道路。(註119)

21日零時10分，愛沙尼亞正式宣佈獨立。(註120)5時40分，維爾紐斯電台被蘇軍佔據。(註121)愛沙尼亞電台及電視台亦被佔據，所有廣播8時中斷。(註122)13時40分，攻擊拉脫維亞議會大樓的行動突然中斷。(註123)晚上，部隊從維爾紐斯電話機樓及電視台撤出，再撤離市中心。(註124)政變失敗消息傳出後，拉脫維亞馬上宣佈上獨立。(註125)

北約外長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俄羅斯外長安·柯斯尼夫(ANDREI KOZYREV)前赴布魯塞爾，與貝克會面。(註126)但會議的討論不能追上蘇聯局勢的戲劇性發展。

8月22至24日

22日早上7時19分，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伊、總理西拉耶夫及克留奇科夫陪同下，離開克里米亞。（註127）

10時至13時30分，100,000人在俄羅斯議會大樓前舉行勝利集會。群眾揮舞俄羅斯紅白藍旗；高喊口號要求戈爾巴喬夫辭職。（註128）戈爾巴喬夫抵達莫斯科立刻表示，他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仍會致力於改革共產黨。18時15分，戈召開新聞發佈會。會上，他說：“我覺得社會主義是正確的”。（註129）戈任命副內政部長瓦·特魯欣(VASILY TRUSHIN)、克格勃副主席列·舍巴爾申(LEONID SHEBARSHIN)及副國防部長兼總參謀長米·莫伊謝耶夫大將(MIKHAIL MOISEYEV)(莫政變期間在克里米亞渡假)接替普戈、克留奇科夫及亞佐夫。

立陶宛宣佈取締共產黨，以及把它的財產及檔案、資料充公。葉利欽下令解散俄羅斯境內武裝部隊的共產黨組織。（註130）《消息報》宣佈撤換總編輯。（註131）

23日，戈爾巴喬夫與九個加盟共和國領袖舉行會談。會談後，戈向俄羅斯國會發表講話，宣佈由前俄羅斯內政部長域·巴蘭尼科夫(VIKTOR BARANNIKOV)、巴卡京及空軍司令耶·沙波什尼科夫將軍(YEVGENY SHAPOSHNIKOV)代替特魯欣、舍巴爾申及莫伊謝耶夫。三個調動都是應葉利欽的要求作出的。戈並同意撤換整個聯盟政府部長會議。

國會會議上，葉利欽得勢不饒人，即席簽署法令禁制俄羅斯共產黨活動。戈表示反對，拒絕在法令上加簽他的名字。15時，莫斯科市議會把蘇共及俄共所有辦事處封鎖，全部財產收歸俄羅斯所有。

葉利欽公佈他早一日已簽署法令，禁止《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工人論壇報》、《莫斯科真理報》及《列寧旗幟報》出版，以及把各報的財產充公。塔斯社首腦里·史別列當諾夫(LEV SPIRIDONOV)被撤職。《真理報》23日版

把“蘇共中委會機關報”副題刪除，以“蘇共政治報章”(GENERAL POLITICAL NEWSPAPER)代替。(註132)

烏茲別克總統伊·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納扎爾巴耶夫及摩爾達維亞共黨領袖先後退出蘇共。拉脫維亞禁制共黨活動，把它所有財產及檔案充公。

24日，《真理報》脫版。(註133)晚間新聞節目VREMYA宣讀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總書記職位的聲明。戈在聲明還說中委會應該自行解散。節目亦宣讀了中委會的聲明。聲明表示蘇共願意承擔政變的“道義責任”。

克拉夫丘克宣佈退出蘇共政治局及中委會。烏克蘭國會通過決議宣佈獨立。摩爾達維亞取締共產黨。(註134)

戈爾巴喬夫任命西拉耶夫出掌臨時治理經濟委員會，直至新聯盟政府成立為止。

為甚麼會發生政變？

1989年8月，雅魯澤爾斯基提名馬佐維耶茨基出任波蘭總理，組織團結工會政府。10月7日，匈共為迎接1990年春的多黨制選舉自行解散，成立社會黨。這些劃時代的轉變都沒有觸發政變。相反，1991年8月19日，俄羅斯、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打算於20日簽署新聯盟條約前夕，蘇聯發生了八·一九政變。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分別？

在分析波蘭變局時，我們論述了1981年和1988-89年的分別。經過波蘭社會生產關係在八十年代的急劇變化後，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波共主流派的階級屬性起了根本上的轉變。圓桌會議協議體現了波蘭新興幹部階級的利益。雖然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與原定計劃有所偏差，但因此而推翻圓桌會議協議對新興幹部階級會更為不利（因為這會導致波蘭的西方債權人馬上把波蘭「清盤」）。社會生產關係的轉變，加上客觀經濟形勢的壓力，不斷削弱波共中抱殘守缺的死硬派在黨政軍企內的

社會基礎。基於以上因素，波蘭1989年沒有發生政變是符合邏輯的。

匈牙利的情況大同小異。這點上文已有所分析，無需在此再次贅述。

反觀蘇聯的情況，經改至今仍未真正起步，新興幹部階級沒有形成，聯盟政府的階級屬性維持不變。但“開放”、“重整”和新東歐政策加劇蘇聯社會的崩潰；共和國本位既得利益集團（以俄羅斯和烏克蘭為主）向聯盟政府奪取政治和經濟權力。原統治階級內部分化成兩個敵對的集團。跟波蘭和匈牙利不同，這兩個集團旗鼓相當，實力較為接近。1990年以來，兩個集團已幾番較量（「倒閣風」、1991年1月波羅的海事件、帕夫洛夫六·一八奪權舉動）。戈爾巴喬夫三、四月工潮後全面向共和國本位利益集團傾斜，對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和產軍綜合體非常不利。新聯盟條約的簽訂將更加置它們於劣勢。

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階級會自動和平地放棄它的統治。在分析波蘭和匈牙利變局時，我們論證了這兩個變局沒有推翻以上定律。蘇聯保守勢力發動八·一九政變，再一次為這個歷史定律提供了驗證。

不首先從波蘭、匈牙利、蘇聯三國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發展著手，分析三國政權的階級屬性的轉變（或基本上維持不變），探討原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的演化，就無法理解為什麼波蘭和匈牙利在面對比蘇聯新聯盟條約的簽訂更為深刻的轉變之下，依然能夠順利過渡，而蘇聯則相反發生八·一九政變。

政變失敗的原因

有一種意見認為，政變失敗是人民力量的勝利；是光明戰勝黑暗、理性戰勝非理性。關於“光明”、“黑暗”、“理性”、“非理性”這些範疇的科學價值，筆者已多番提及，無

需在此再費筆墨。

至於人民力量，很可惜，這又是一個神話。布什、戴卓爾等渲染這個神話，因為他們希望人們擁護最親西方的葉利欽集團。我們要打破這個神話，因為我們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揭穿葉利欽集團的真正階級屬性。

8月19日晚上(香港時間，莫斯科時間為下午)，筆者與一位來自內地的民運朋友討論政變，談到葉利欽所發出的罷工呼籲。筆者指出，雖然葉表面上有著民粹主義煽動家的形象，但勞動群眾對他的真正階級利益屬性是有所警覺的。當然，他在俄羅斯總統選舉贏得超過半數選票。但在選舉中因對手弱(雷日科夫執政以來沒有建樹；1990年以來的經濟崩潰雖然不應歸咎他，但人們仍然會「入他的數」)而投葉利欽票是一回事；在政變環境下奮起反抗完全是另一回事。要一個階級集體起來面對槍炮，除非這個階級對發出號召的人的階級屬性有十足信心，否則很難成事。很多工人都意識到，葉利欽鼓吹的經改方案底下，工人將會成為犧牲品。1991年7月間，一間美國新聞機構進行一項民意調查，五成被訪者贊成維持「社會主義」(即反對激進市場化改革)。況且，很多工人亦意識到，社會混亂是經濟崩潰的主因，而葉利欽方案底下，社會混亂只會加劇。

基於上述，筆者當時估計，罷工號召的反應會冷淡。事態的發展亦確實如筆者所預料。雖然塔斯社和電視晚間新聞節目均對號召加以如實報導，莫斯科、列寧格勒等主要城市均沒有發生罷工。政變期間，一個莫斯科車間工會代表接受訪問時，對西方記者表示，為了恢復社會秩序，他會遵守八人委員會的命令。(註135) 根據西方記者報導，守衛議會大樓及參加9月20日150,000人集會的群眾很多都是年青人。(註136) 唯一具規模的罷工發生在西伯利亞的煤礦場，但距離總罷工水平很遠。據事後報導，煤礦工會領袖能夠在俄羅斯議會大樓內用電話組織罷工。(註137) 5月煤礦工潮獲得解決，戈爾巴喬夫同意礦場外匯留成八成半，為葉利欽與煤礦之間建立起良好關係。所

以，煤礦成為響應罷工號召的唯一隊伍，不難理解。

8月20日參加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集會的群眾先後有150,000和100,000人。與中國八九民運五•一七及五•一八連續兩日超過二百萬人遊行示威，上述數目顯然小巫見大巫。聲勢浩大的北京群眾況且未能迫令李鵬下台，莫斯科那150,000人所能發揮到的作用有多大，不言而喻。

8月20日晚間留守在俄羅斯議會大樓外的群眾不足二萬。(留守列寧格勒市議會外約五千人。(註138)) 這些人的勇氣當然十分值得我們敬佩。子夜時份，一些坦克和裝甲運兵車試圖越過路障，群眾義無反顧、慷慨赴死加以阻截的英勇行動，不禁令我們想起六四的烈士。據報導，三名群眾壯烈犧牲後，坦克部隊司令部召開會議，決定把所有行動終止。(註139) 筆者暫時無法從其他資料來源證實這項報導的準確性。但即使以上報導無誤，也不能引伸說政變的失敗出於群眾的反抗。

其實，試圖衝破路障的裝甲部隊的目的是否要進攻議會大樓，似乎還是一個疑問。據報導，那些路障其實並不是放置在引向議會大樓的馬路上。(註140) 根據我們掌握到的有限資料，肯定有接到命令進攻大樓的部隊是克格勃的ALPHA GROUP和國防部傘兵部隊。如前所述，這些部隊在接到命令後都決定變節。

假使八人委員會決心要逮捕葉利欽，他們不用等待到8月20日晚/21日凌晨。8月19日葉在裝甲運兵車宣讀聲明時，議會大樓前的群眾少於200人，議會大樓完全沒有防禦，路障仍未出現(群眾晚上才開始築路障)。(註141) 當時要拘捕他實易如反掌。其實，8月19日清晨宣佈解除戈爾巴喬夫職務前就把葉利欽拘捕，更為上策。據一項報導，8月19日早上，克格勃人員確有嘗試逮捕葉利欽，但遲了40分鐘才抵達葉在莫斯科郊外的渡假屋(葉當時正在渡假)。(註142) 無論這項報導是否準確(筆者持有懷疑態度)，有一點是肯定的，政變的策劃完全不合格。倘使葉利欽一早便就逮，就不致出現進攻俄羅斯議會大樓的需要

。鑒於此，認為8月21日凌晨阻截裝甲部隊的群眾打敗政變顯然不符合事實。

一些較為深刻的西方評論家亦指出，“人民力量”是一個神話，政變流產出於兩個因素：策劃上不夠堅決；武裝部隊出現分裂。

1981年12月波蘭實施軍管。軍管公佈時，坦克已據守各主要建築物、設施。數小時內，幾乎所有團結工會領袖已成為階下囚。所有通訊完全切斷，新聞受到嚴格檢查。

反觀八·一九政變，政變公佈後超過兩小時，坦克、裝甲運兵車才開進莫斯科。六小時後，裝甲部隊駛進市中心區，陷入擠塞的交通之中。紅燈亮起時，車隊竟然守秩序地停駛。（註143）

據美國間諜衛星圖片顯示，8月19日早上，沒有部隊從外地調往莫斯科。派進莫斯科的部隊是原先駐紮在市郊的部隊。換句話，八人委員會並沒有精心策劃調派最忠心的部隊執行任務。（註144）

八人委員會宣佈除九份報章外，其他出版一律禁制。但卻沒有派軍隊封鎖被禁刊物的辦事處。8月20日，數份被禁報章毫無禁忌地出版聯刊。（註145）

更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據報導，克留奇科夫18日把亞納耶夫和帕夫洛夫召往克里姆林宮商討政變時，兩人竟然醉意醞釀。（註146）

一些評論認為八人委員會搞錯了目標，不明白葉利欽而非戈爾巴喬夫才是他們心腹大患。這個看法所顯示的並非八人委員會天真，而是論者自己幼稚。八人委員會當然明白拘捕葉利欽的重要性。據加里寧事後說，委員會要求他簽署三十張空白的拘捕令，他照辦。（註147）但委員會沒有使用過任何一張。為什麼委員會不一早把葉利欽等人逮捕？為什麼這場政變策劃得如此輕心、不夠果斷、不夠堅決？

從頭到尾，八人委員會都強調免除戈爾巴喬夫職務完全符

合《憲法》。他們以副總統亞納耶夫作為委員會名義上領導，宣佈會召開國會追認，都是為了替政變鋪上「符合憲法」的面紗。既然「符合憲法」對他們那麼重要，他們顯然沒有任何借口事先把葉利欽拘捕（事後則可指他違反緊急狀態規定）。同理，他們沒有切斷國內或國外任何通訊，使葉利欽隨時可與外國領袖聯絡；任由西方傳媒就政變進行採訪；沒有對「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進行干擾（註148），令蘇聯人能隨時收聽到有關的報導，以上全部都是礙於「符合憲法」的考慮。塔斯社和電視晚間新聞節目轉載葉利欽的號召亦是為了表示「事態正常」。政變策劃上和執行上不夠堅決皆緣於這種「符合憲法」和「事態正常」的考慮。較為深刻的西方分析家都看出這是八人委員會的致命弱點。為什麼委員會要強調「符合憲法」和「事態正常」？

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策略所賜，蘇聯經濟1990年開始全面崩潰，加上東歐投奔西方集團，蘇聯經濟上任由西方主宰成為無從逃避的命運。保守勢力亦不得不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短期內，通過緊急狀態的實施，把社會秩序穩定下來，蘇聯經濟可以爭取到短暫的喘息空間。再者，短期而言，西方國家宣佈凍結經援對蘇聯的影響不大，因為它們所已經承諾提供的數目微不足道。（註149）但中期而言，西方的援助是不能缺少的。八人委員會知道，倘若他們採取果斷、堅決的手法，縱使他們能完全控制國內局勢，西方國家必定實行長期全面制裁，他們中期而言亦無法越過經濟這個關口。礙於這個考慮，他們強調「符合憲法」和「事態正常」，希望可以兩全其美，既能控制國內局勢，亦可避免西方全面制裁。

世事顯然不會那麼理想。「兩全其美」的奢想終於換來顧此失彼，委員會既贏不到西方國家的「理解」，亦無法控制國內局勢。歷史往往是諷刺的。戈爾巴喬夫事後說政變失敗是他的政策令民主思想在蘇聯落地生根的結果。他這個講法有一半說對了。他的政治生涯得以挽救確實與他的政策有關。但那是

由於他的政策把蘇聯經濟弄至如今的地步。

保守勢力所處於的矛盾困境給葉利欽製造了機會，但葉利欽能夠把握這個機會還要借助另一個因素。

政變之初，八人委員會希望能夠「兩全其美」。但事態的發展迫使他們不得不改變初衷，要對葉利欽採取行動。如前指出，8月20日晚／21日凌晨是關鍵時刻。所有資料顯示，進攻俄羅斯議會大樓的行動失敗，主要出於武裝部隊內部分裂。

上文指出，進攻俄羅斯議會大樓最有效的辦法是空降精銳部隊到大樓天台。事實上，葉利欽等人最擔心的也是這種情況，因為這個辦法可以完全避開大樓前面的群眾，而大樓本身的防禦設施實際上形同虛設。如上文提及，傘兵部隊司令員格拉喬夫拒絕接受八人委員會進攻議會大樓的命令（此所以 TULSKAYA 傘兵師變節）。甚至有一項未經證實的報導稱，格拉喬夫因此於8月20日被捕。（註150）

空降不成，克格勃精銳部隊又拒絕執行進攻命令，終於，經過21日凌晨數小時的混亂後，克留奇科夫放棄進攻計劃，告訴波爾貝理斯他們“可以安心睡覺”。

關於20日晚、21日凌晨各個部隊的進退情況，我們現在所能掌握到的資料不多。但大致上，以上的結論應該是可靠的。

政變一開始，已經有武裝部隊將領拒絕支持八人委員會，或甚至投向葉利欽集團。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開始便站在八人委員會的對立位置。（註151）政變後，葉利欽挑選他為國防部長當然事出有因。19日一日之內，包括莫斯科在內的11個俄羅斯城市的衛戍部隊司令員表態支持葉利欽。（註152）20日，俄羅斯克格勃最高層指揮官華·波里阿科夫將軍（VLADIMIR POLYAKOV）表示俄羅斯克格勃只承認葉利欽，而不承認克留奇科夫。（註153）同日，蘇聯參謀部新星、地面部隊將軍康·科柏斯（KONSTANTIN KOBETS）投向葉利欽陣營，表示部隊沒有義務接受八人委員會的命令。（註154）

其他拒絕與八人委員會合作或支持葉利欽的武裝部隊將領

包括：波羅的海艦隊司令華·切爾維耶夫(VLADIMIR CHERNAYEV)海軍上將(註155)；伏爾卡(VOLGA)軍區司令阿·馬加索夫將軍(ALBERT MAKASHOV)(註156)；甘察卡核子潛艇司令費拉耶夫；等。雖然列寧格勒軍區司令薩姆索諾夫沒有反對八人委員會，但他與索布恰克達成協議，不派軍隊進入列寧格勒市。(註157)

支持八人委員會除陸軍司令華爾蘭力科夫外，還有加里寧、空防部隊司令兼副國防部長伊·切狄亞克將軍(IVAN TRET-YAK)等。(註158)據新任外交部長潘金稱，別斯梅特內赫曾簽署文件指示他服從八人委員會。(註159)據報導，三十名駐外國大使支持政變。(註160)潘金是唯一一個公開譴責政變的駐外國大使。(註161)

加盟共和國方面，阿塞拜疆總統阿·梅達里波夫(AYAZ MUTALIBOV)公開支持政變。他說政變是“過去幾年來為蘇聯帶來混亂的政策的自然結果”。(註162)烏茲別克也支持八人委員會。(註163)公開反對政變的有(不計俄羅斯)摩爾達維亞、吉爾吉斯(註164)及哈薩克。烏克蘭19日拒絕譴責八人委員會，但20日改變態度宣佈不接受委員會的命令。其他共和國或是採取觀望態度(如格魯吉亞)，或是對八人委員會加以默認(如白俄羅斯)。(註165)值得留意，主宰新聯盟條約的制訂的三個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及哈薩克)都反對政變。如前所述：①三個共和國都會從激進改革、新聯盟條約的實行得益；②上述三個共和國的企業幹部和小國的企業幹部分別構成激進派及保守力量的社會基礎。摩爾達維亞反對政變與它的分裂傾向一脈相承(400,000人反政變示威使總統史尼戈爾沒有選擇餘地)。各共和國的態度中，只有吉爾吉斯的反對我們暫時無法根據手頭上的有限資料給予合理解釋。

不過，顯然，政變的命運並不取決於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態度。勝負完全繫於莫斯科的決戰。

根據馬克思主義分析，武裝部隊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獨

立的社會實體。作為國家機器一部份，它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如前所述，保守勢力與激進改革派之爭，是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和產軍綜合體與俄羅斯本位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角力。原統治階級分化成為兩個對立集團，武裝部隊也隨之而分裂是符合邏輯的發展。應當注意，投向葉利欽的部隊不僅限於俄羅斯克格勃和莫斯科等城市的衛戍部隊，還包括如沙波什尼科夫這些聯盟國防部的人物。上文分析，俄羅斯集團所要求的，不是聯盟馬上解體，而是在俄羅斯要求的條件下建立新聯盟。所以，俄羅斯本位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伸展到聯盟國防部毫不以為奇。主觀意識上，沙波什尼科夫等人擁護葉利欽可能是出於擔心會爆發內戰。但我們判斷一個人不以他對自己的認識為根據。武裝部隊的分裂以原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分化為客觀基礎。

值得留意，武裝部隊在波羅的海三國的行動果斷而堅決，絕無拖泥帶水，部隊沒有出現分裂，與莫斯科的情況形成強烈對照。箇中原因顯然是由於在波羅的海三國，上述兩個敵對集團的對抗是無關重要的矛盾。

綜合上述，1990年以來，社會的崩潰令俄羅斯本位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經過迅猛發展凌駕於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和產軍綜合體；後兩者的實力因經濟形勢變得十分脆弱。政變期間，基於以上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轉變，八人委員會被迫留出一條生路給葉利欽，而武裝部隊中擁護俄羅斯集團的隊伍明顯佔上峰。葉利欽能夠擊退八人委員會純粹是這種力量對比關係的結果，群眾在整件事件中只扮演點綴的角色。

